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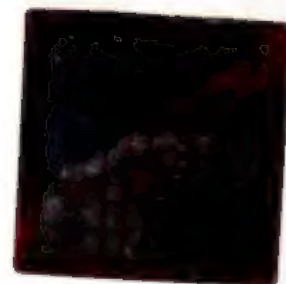
Education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 丛书英文版主编\弗兰克·帕金
- 丛书中文版主编\周殿富 韩冬雪
- 丛书中文版执行主编\曹海军

革命与反革命

[英]彼得·卡尔佛特 著
张长东 等 译



*Revolution &
Counter Revolution*

吉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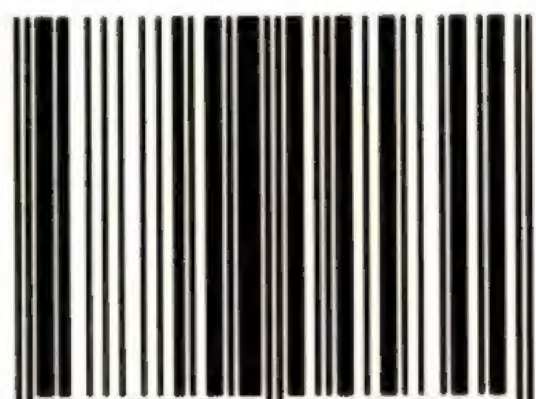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高等教育最权威的社会科学教材之一
中国10余所最高学府知名学者联合推荐

策划编辑: 崔文辉
责任编辑: 崔文辉、崔 凯
装帧设计: 陈 东

Revolution & Counter Revolution

作者简介: 彼得·卡尔佛特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学教授。他写了许多论述革命的著作, 其中包括《革命》(London, Pall Mall, 1970)、《对革命的一项研究》(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以及《革命与国际政治》(London, Frances Print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被讥为是托洛斯基主义者的分析革命的人。

ISBN 7-206-04584-7



9 787206 045844 >

ISBN 7-206-04584-7/D. 1394
定价: 14.00元

革命与反革命

[英]彼得·卡尔佛特 著
张长东 等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与反革命/(英)卡尔佛特著;张长东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书名原文: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ISBN 7-206-04584-7

I. 革… II. ①卡… ②张… III. 革命理论 IV. D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879 号

Calvert, Peter

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Original ISBN: 0-335-15398-4)

Copyright©P. A. R. Calvert 1990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5-1367

革命与反革命

著 者:彼得·卡尔佛特 译 者:张长东等

责任编辑:崔文辉 崔 凯 封面设计:陈 东 责任校对:闫 勇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址:www.jlpph.com 电话:0431-537801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5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4 字 数:9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584-7/D·1394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编委会名单

主 编：周殿富 韩冬雪

学术咨议(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马德普	马敬仁	孙晓春	李 强
任剑涛	应 奇	何怀宏	林尚立	姚大志
胡维革	贺照田	高 建	袁柏顺	徐湘林
夏可君	顾 肃	梁治平	曹德本	葛 荃
谭君久	薄贵利			

编 委：孙荣飞 朱海英 刘训练 彭 斌
叶兴艺 赵多方

第一期执行编委：孙荣飞 朱海英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总序暨出版说明

自 19 世纪中后期西学东渐以来，在西方思想和相关书籍引入方面的成就可谓蔚为大观，但总的来说，大都强调系统理论的引进和评介。自 20 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介绍和翻译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著作成为了“文化热”的先导，其中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等丛书曾经滋养和影响了数代学人的学术生命。

本套丛书立足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虽名曰基本知识，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学术普及，每本小册子的著者皆是该研究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以往这类书籍的引进通常表现为编纂学科史的教材形式，将知识的引介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上。故此，作为单纯的基本概念的追本探源式的梳理工作略显不足，这也就使得研究者对各家各派的观点难以获得系统的了解。而从可读性和理论的深入性上来说，本套丛书既适合于初次涉猎该领域的非专业人士、本科生，成为他们的领航性的参考文献，也能够满足于对此领域具有相当知识积累且有一定专深研究的研究者的专业化要求，因此能够将系统性理论的引入与基本概念的拓展齐头并进，可谓一举两得。

需要指出的是，该套丛书以社会科学自诩，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反映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文化内涵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并不具有自然科学本身拥有的客观性和普世性。毫无疑问，这套丛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以西方特有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为基点，看待西方世界和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对此，我们应该确立批判与扬弃、借鉴与建构并举的思想立场。毋庸置疑，在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并吸收西方有益的社会科学文明的普遍性成果，借鉴和利用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经验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食洋不化的崇洋心态和西化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观，在坚持学术自主性的“洋为中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规范化、科学化。

编者

出版导言

到 21 世纪的今天，“革命”作为一个术语，如此广泛地被使用，甚至一次清洁活动都可以用革命冠之，以至于它的最初面目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和无关紧要了。但是，在需要系统地了解社会科学的今天，还是有审慎分析一些常用的社会科学术语的必要的，这是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时必须补的课程。

同其他社会科学名词一样，知识背景的差异导致了解释的迥然不同。对于“革命”，和随之伴生的“反革命”，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定义上就存在着分歧。显然，本书作者很多的思想资源时取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但是，其理解却存在着比较大的误差，并进而导致他关于革命理论其他解释的种种缺陷。同时，作者对于一些革命实践，尤其是中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持有一些错误认识和见解，个别评论和描述方式也不恰当。为尊重作品的完整性，我们除了删改了极少几处外，基本保留了其原貌，希望读者在

阅读时一定要把握好尺度，坚持批判阅读的态度。当然，就本书的学术价值来看，它是一部少见的非托洛斯基主义的西方革命理论著作，参考对比的价值非常大，有助于丰富我们的革命理论研究，从这个角度讲，该书的借鉴意义是巨大的。对待本书，应该像我们对待西学一贯态度一样，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去其讹误，取其精华，理性阅读，合宜取舍。

编者

前 言

本书首要的目的是重新审视革命在现代社会理论中的地位，并重申系统学习社会科学的必要性。在一个知识氛围和政治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动的时代，惟一可以确定的是，21 世纪的世界并不会变得像我们当中一些人 20 年前所期望的那样好。然而，由于运气，以及我们的智力的运用，这个世界至少不会变得像我们今天所害怕的那样差。

编辑启事

从我们角度看，出版业的目的可以简约为一句话：让更多的人分享有价值的思想。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一贯的主推严肃学术作品的出版宗旨，而且，在将来的岁月里，更会奉此为主臬，倾力推介品质优良的学术著作，以促动中国的学术繁荣和人文复兴。

不过，由于我们的学养和视野的局限，常常会犯遗珠于外、奉蔽为珍的错误，以致贻笑大方。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获得知识界的援手，也企盼得到真知灼见者的棒喝。如果各位读友有具价值的学术作品的选题，或者建议（当然更欢迎直言不讳的批评），甚至只是一些闪光的想法，请不要吝惜，提供出来与我们一起共享，（一经我们采用，提出者将获得我们赠送的数量不等的学术图书，书目见附录）一齐推动中国的学术出版事业的进步。

同时，我们经常接到一些读友的反映，说有些书难以买到。所以，我们开通了学术图书的直销渠道，各位读友可以任意购买附录中开列的图书。购买方法是：通过我们直销通道，请读友将需要的图书书目告诉我们，我们会立即回复告知是否有存余。如果有存余，请购买者将书款汇给我们并告知邮寄地址，我们接到书款后，立即安排邮寄和开具收据发票。凡购买我们图书者，均免除邮寄费用。一次性购买图书金额在 40 元人民币以上者（含 40 元），将享受 75 折优惠，同时免除邮寄费用。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观察	1
第二章 阐释	28
第三章 理论之形成	60
参考书目	100
译者后记	111

第一章 观察

观察什么？

越重要的术语越可能被滥用。举例来说，大部分人都用“重”（weight）这个词来表达物理学家称之为“质量”（mass）[或者是医生说的肥胖（obesity）]的东西。而在社会科学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由于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本身就有其自身确定的含义，社会科学家很少能成功地赋予其（新的）严格定义的意义。“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词汇。

在 20 世纪 40 年代，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因为并不存在革命，或者说，只存在一场革命。而且当时的问题只不过是革命会在战争之后多久发生。或许是因为其面世的时机不好，或许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人们如何运用武力取得他们自己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又是如何与大众所希冀的目的不一致之类的真相，凯塞林·科利（Katharine C. Corley 1943）杰出的论述革命的著

革命与反革命

作《军队与革命的艺术》一书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关注。

20 世纪 50 年代，冷战统治了所有的思想，划分了战线。一方面，革命是变革的希望；另一方面，革命是对自由世界的价值观的最大威胁。而在这场冲突的边缘，则是正在兴起的第三世界，为解脱早已式微的殖民主义的统治、解放自己而起义斗争。这些斗争被卷入意识形态的矩阵之中，每个竞争对手联盟都努力使战斗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革命流行起来了。每个人都干起了革命，或者，毋宁说，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所做的就是革命。革命是一种热切的、动荡的兴奋，众多敏感的社会科学家卷入其中而被冲走，另一些则在精神上转化为长满胡子的政治活动家。定义革命是反革命的，而写革命则是一种风尚。这时也产生了许多不错的读物（Davies, 1971; Kumar, 1971; Mazlish, Kaledin and Ralston, 1971）。

20 世纪 90 年代，革命一词虽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技术领域，但在政治议程中却不再怎么出现了。左派发现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和武装力量相对于阶级的独立性。虽然一方面，美国人挺直了腰杆，将共产主义的阵线打压了回去，而共产主义则把阵线退回了自已控制中的，类似于格林纳达^①之类的地区。但在阿富汗，就像在伊朗，革命的受惠者们不是都没有走

^① 格林纳达位于西印度向风群岛的一个小国，先后为法国和英国所殖民，1974 年独立。因为古巴政府对格林纳达政府的干涉，里根总统于 1983 年 10 月命令 1 900 名美军入侵格林纳达，以保护居住在那里的美国人。

向西方文明，或者说启蒙运动（即使“启蒙运动”这一术语被挪用去描述一些诸如华而不实的蒙昧主义之类看起来不怎么舒服的东西）的理性主义传统吗？相反，我们只能等着看哪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派别将上台执政。我们需要有一些关于下一步将发生什么的清晰的观念，即使实际上我们并不是那么喜欢如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立场出发，我们无法确认阿富汗和伊朗的事件是否算得上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很明显，我们需要清晰地界定每个术语的含义。

术语的起源

“Revolution”在工程学中指循环运动的一个单位；在政治中则指方向的突然变动。其在政治学中的使用始于 15 世纪的意大利。“Rivoluzioni”被认为是运行的行星在到达某个交接处时发生的突然变化——由于当时还是一个迷信占星术的时代，命运是每个希望成为政治领袖的人都需要考虑的。一直到 1662 年，贵族克拉雷登（Clarendon）还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英文的这个词来指国王查理二世的复位和国民政府的下台，后者的统治被其认为是“恶星带来的灾难”。直到 1688 年所谓的光荣革命——一系列被其反对者和支持者都称之为革命的事件——的时候，这个词还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词（Calvert 1970a）。这时候《简明牛津英语辞典》给革命的定义是：“新的统治者或政治组织通过武力取代旧的统治”。

然而，到了 18 世纪，由于 1688 年的事件不再被认为仅仅

革命与反革命

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以英格兰内战位为起点的一系列变革过程的结束或顶点，“革命”一词开始改变其含义了。当然，它还保留了原来的、广泛的含义。18世纪初期的知识阶层中流行的读物中有阿比·佛托特关于葡萄牙、西班牙和古罗马革命的几本书，远在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当时也收藏了这些书。然而，革命这个词扩展成为指涉政治动乱和社会剧变之后恢复政府秩序、参与政府的概念，以及变为向一个更文明的社会进步的意义上的术语，这一（转变）过程却非常缓慢。因此，18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人开始在这个更为特指、更为积极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认为法国需要一场革命。与传统的观点相反，既非法国革命，亦非美国革命（考虑到其地域偏远）导致了革命的词义变迁。早在1789年，当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时候，观察者们都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革命最终到来了。而且，当我们今天称为法国革命的事件还没有怎么开始的时候，海峡对岸的埃德蒙·伯克就已从一个保守主义者真正的洞察力出发，抨击这一场革命。

因而，是法国革命给这个术语打上一个永久的印记，在其旧的用法上增加了新的含义。在社会科学中，这个新的含义今天已经取代了其他含义。举例来说，《企鹅政治学辞典》的作者，大卫·罗伯特森（David Robertson, 1986, pp. 290 - 1; 着重处），毫不含糊地定义了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

我们所称谓的革命，严格意义上说，是政治系统
的一场全面的暴力变革，不仅仅改变了社会的权力分

布，还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在政治科学里，其主要的含义是：有所准备的、有所意图的，而且经常是暴力性的，由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领导动员起民众反对现存体系、推翻旧统治阶级。

我们可以检验罗伯特森的定义，因为他给了我们三个例子：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很好地和概念相符，但法国革命却并不相符：这场革命并非有意图的，而俄国革命同样未能被检验：它并没有领导被动员的大众反对旧体系。很明显，这个定义过于严格。

吉登斯（Giddens, 1989）则显得更为谨慎，他（以一个社会学家的身份）首先说明革命不是什么。一场仅仅用一批领导人更换另一批领导人的政变（原文为法语）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革命”。然后他提出：革命必须包含一场群众运动，导致大规模的改革或变革过程，而且涉及运用或威胁运用武力。因此，他的定义是：“群众运动的领袖通过武力方式取得国家权力，并随之以其用来发动大规模社会变革”。（Giddens, 1989, pp. 604 - 5）然而，这个定义同样是不规则的。俄国革命是集团斗争而非群众运动的产物。运动是由其领导人通过政变攫取权力之后发起的。虽然中国 1949 年的革命再次很好地符合了这个定义，但是，希特勒 1933 年在德国登上权力之峰算不算是一场革命呢？虽然他先是被赋予了权威，然后通过系统地、有预谋地使用武力，运用国家权力去获取更大的权力，但他最初还是从群众运动中发迹的。同样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攫取

革命与反革命

权力和随后的社会变革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联系，而吉登斯留给我们一个疑问：我们应该如何命名一场伴随着大范围社会变革的政变？

所有观察者们会一致同意的一点是“革命”是一个指一种大规模社会转型过程的术语，而且这种时期是很不寻常的。虽然大家对到底发生过多少场革命并没有一致意见，但使用这个术语的人都有一个基本共识：（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很少或几次革命。经常被举出来的例子是英国革命（在英国还经常被称为内战）；美国革命（在英国尚被称为是美国独立战争）；法国 1789 年革命；1910 年墨西哥革命；俄国 1917 年十月革命；中国 1949 年的革命；以及 1959 年古巴革命。可能从中国 1912 年的革命一直到 1979 年尼加拉瓜和伊朗革命，另外还有十几场革命能被广泛——如果不是普遍——认可为是主要的社会革命的合法的例子。

当然，一个术语的含义在普遍的通俗用法和更为严格的专业用法之间存在差别并非一个使用其通俗用法的充分理由，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然而我们必须有一个定义，这并非是一个枯燥的智力练习，而是严肃思考的真正基础（Sartori, 1970）。定义是取得任何进一步认识的基础，而要使定义有用，我们必须限定其含义。然而，在社会科学中，当我们仅仅为了概念的精确性而非其它任何原因而限制一个概念时，我们必须很谨慎。而过于严格的“革命”的定义的问题是这个定义并不确切。事实上，这个定义如此宽泛，其中包含了那么多现象，而使得进一步的分析几乎不可能。而同时，这个概念把许多其

他事例排除在外，以至于我们无法通过研究留给我们的仅有的几个个案而得出有用的普遍性结论。

那么，为何革命成为一个主要的有机概念（organizing concept）呢？原因并不难发现。法国革命发生在启蒙运动之后，而那时启蒙运动早就让人们普遍接受按照一个新的、更好的模式重新组织社会的信念。但是革命的到来还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用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966, p. 35）的话来说：“在欧洲的君主和政治家一开始看来只不过是一段过眼烟云、一个民族成长痛苦中的并非特别的征兆的事物，现在被发现却是一个全新的，与已往运动截然不同的、如此广泛和不同寻常，如此难以理解、让人困惑。”如果事件的真实过程是超出预期的，甚或在某些方面不受欢迎的，那么在欧洲先进国家的中心地带发生的人类意志能够创造事物的新秩序的实际的示例，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革命是通往未来的道路，应该被视为是一个超越现存政治界限的社会过程而非社会事件。事实上，当战斗扩展到埃及、印度、好望角、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的时候，革命看起来是改变全世界，而非仅仅是欧洲的面目的力量。

所以，毫不奇怪，马克思假设——而非说服或证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工具是革命的新的、伟大的力量。对于19世纪其余的那些可能成为革命者的人来说，他们看起来似乎已经学会了如何调节这个历史的火车头了。他们失败的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在19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很多革命，但是无一被广泛认为是伟大的社会革命。当时发生了无与伦比的变革，但是这一变革却伴随着一个渐进的演变和稳定政治秩序的出

革命与反革命

现。统一、巩固、和权威是政府取得了对其对象的权力的时代的口号。同时，社会进步的假设未受到任何挑战。当 1914 年欧洲爆发世界大战时，欧洲的伟大的帝国已经瓜分了五大洲，并教导世界上其他人如何像欧洲人那么生活。而欧洲之外的仅有的两大强权，美国和日本，也在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道路上处于前列。

革命的模式

从现实中提取出现象或事件的最重要的一套相关的特性，是社会科学家基本的方法。我们称这些相关特性为“模型”。模型本身当然并非是现实，但由于它们简化了现实，从而更清晰地突显出重要的变量，使我们能以更有效的方式来思考它们。问题是，另一方面，模型通过某种特定方式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我们开始忽略和我们的预想不一致的证据；我们拒绝接受与模型展现给我们的选择性的现实不一致的结论。了解模型的缺陷是有效运用模型的关键条件。

1789 年的法国革命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使两百年过去了，由这一系列非凡事件引起的激情还没有消逝。更近时期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追随乔治·索亚·佩蒂 (George Sawyer Pettee, 1938)，将这场革命定义为大革命的典范。问题是从中分离出和各种语境相关的那种特性。

自由主义模型视法国革命根源于既有社会秩序的缺陷和失败。人民的代表们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呼吁并取得了在国民

会议中的代表权。但他们正义的努力却被各种保守势力——国王和贵族害怕丧失其各种特权，欧洲的保守势力则考虑自身的安全——所阻挠。早就因为旧制度的错误和无效管理而破产的政府无力应付这些加诸其身的压力。随着越来越多的激进分子走上了前台，革命超出了可控制范围，随之产生了一个恐怖专政时期——如果及时采取恰当的手段的话，这种统治本来是可以避免或被转移的。最终，在血泊之中，群众的激情消逝了，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僚们被推翻了，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宽松的、腐败的、放纵的时期随之而来，这在法国革命这个例子之后经常被称做是热月党人的反动（a Thermidorean Reaction）。这个时期随之打开了通向一条巩固一个新的、更有技术效率的军政府政权的道路，而这一政权很快越来越像旧秩序。

由这个经验推而广之，后来的自由主义者突出强调宪政主义和代议制，认为一旦民众取得了投票权，他们自己就可以安全地替自己申冤，而产生有序的社会变革。诸如 1905 年俄国革命之类的民众起义，发出了社会需要一场改革的明显的信号。在大不列颠，当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听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屈服于其大臣们的意志而解散杜马的消息的时候，在议院大喊“杜马万岁”。在美国，由于其自身经历过的历史，人们很清楚革命自身最终将如何导向宪政秩序。因此，塔夫托总统认为 1911 年中国君主制的崩溃和取而代之的宪政共和国的建立是宪政优点的最好的，也是最后的展示。基于同样的想法，威尔逊总统也寻求基于民族自决和国联的宪政结构两大原则来

革命与反革命

解决欧洲多年来的不公平。然而，为国联所期冀的这个世界上最证明它并不能实现两个原则中的任何一个。

当然，自由主义视角的革命模型考虑到了社会不平等的经济基础。阿利克塞·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对这场革命的研究指出了，在 1789 年，法国国家机构的基础已经是非常之不合理了（Tocqueville, 1966）。税收被不合理地分配给不同的省份。对农业征税意味着国王无法得到大量零散的税收，贵族的免税权则意味着税收的重负几乎全部压在农民的身上，省际的和省与首都之间的贸易壁垒则阻碍了贸易的自由发展并导致复杂的货币体系、地区间不一致的度量衡。革命是一个伟大的合理化运动，扫除了几个世纪以来补锅匠似的行政管理的残骸，为经济活动建立了新的、合乎逻辑的基础。在那场改革之后，19 世纪初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视自由放任为格言，认为 1846 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使自由贸易成为政府的一条原则，使其进入了一个能为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廉价食物的时代。

直接继承革命的自由主义模型衣钵的是功能主义模型，这种思想今天主要体现在当今美国的查尔姆斯·约翰逊的著作中（Chalmers Johnson, 1964, 1966）。社会系统为了持续生存必须发挥某些特定功能，包括系统维持功能。系统的平衡则通过满足社会需求和压制对政权的挑战来实现。以前定义为“不平等”的现象现在被集体视为是功能紊乱——系统的某些方面不能正常工作了。而多重功能紊乱则意味着系统的主要部分都无法有效运作，会同时导致社会许多部门的离异和被疏远，因而

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 (Johnson, 1964)。当然, 革命的爆发还需要在这种多重功能紊乱状态下一些具体事件来作为导火索或催化剂。多重功能紊乱加上催化剂等于革命。

马克思主义模型也源于功能主义。和托克维尔一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经济理性化为主题, 但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对他们及其同时代的人来说, 法国革命是世界史上具有超越性意义的事件, 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其意义不在于它是一个通向宪政主义以及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不平等的运动, 而在于它是一个尚未呈现的、根本性的、辩证的经济 development 过程的一个阶段。法国革命的真正赢家并不是共和主义者, 也不是专制主义者或波拿巴主义者, ——实际上, 在马克思有生之年, 这三个集团到底谁统治着法国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而他死后的世界则被一个比已往出现过的帝国在各方面都更为强大的帝国所统治。真正的赢家是资产阶级整个阶级, 因为是阶级, 而非个人或党派, 才是历史进程中真正的行动者。

在马克思主义模型中, 法国旧制度的失败源于其经济上的无效率: 旧的封建秩序已用尽其所有的产生能力而需要被摧毁。议会的号召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需要一起行动去推翻旧制度。因为每个阶段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 扫除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解放新的生产力量, 随之而来的政治变革很大程度上并不怎么重要。当战场上的硝烟飞散之后, 新秩序与旧秩序截然不同了——资产阶级, 而非贵族, 掌握了政权。

然而, 不仅是对法国革命的看法, 而且对革命之后将发生

革命与反革命

什么的推断，都使得马克思区别于其同时代的人。他认为，资产阶级是从其剥削无产阶级的劳动中取得其权力的。因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联结在一种辩证关系之内的：正如资产阶级在封建制无法继续提供生产的基础时取代了贵族，无产阶级也将在资本主义最终耗掉其生产能力的时候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虽然资本主义曾给世界带来过巨大的变革。时而萧条时而繁荣的贸易周期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经常性地超出其生产能力限制的证据，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总是能带来政治上的直接影响。马克思相信 1847 年的不景气是 1848 年革命的前奏（Engels in Marx and Engels, 1962, I, p. 120），而恢复了的对贸易的信心则是欧洲反动和 1851 年 12 月波拿巴分子政变的预兆。每一场新的衰退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即将爆发最终危机的信号。巴黎公社打破了欧洲革命的传统，第一次代表工人阶级加入首都的地方政权这一事件则加强了这一信念；正如恩格斯在其为马克思对公社的评论所作的介绍里所言：“这再次显示了，在巴黎，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Engels in Marx and Engels, 1962, I, p. 473）事实上他是错的，在 1876 年——当时政府相对于其公民的脆弱性达到一个短暂的顶峰——之后，伴随而来的是长期的平静和革命活动的低迷。而“时代结束了”（fin - de - siecle）则成为了巴黎资产阶级生活的一句谚语。至今关于公社的回忆还延续着并成为一个神话、一个城市群众起义引起的革命的代名词。当加加林代表人类首次登上星际太空的时候，他携带着一小块巴黎公社支持分子的旗帜——而这面旗帜正是巴黎公社留给后代的一个象征。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型，将一系列特定事件视为是革命期间的关键点，并假设资产阶级通过革命而拥有全部政治权力：在英国是通过内战和击败国王，在法国则是建立国民议会并声称议会拥有所有政治权力。同样，他们还假设（而非论证）：无产阶级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取得权力，而未来的社会革命将首先在先进工业国家爆发，因为那里的阶级已完全两级分化。然而，很明显，直到 19 世纪末，这种两级分化并未形成。虽然财富继续高度集中，但社会流动却并非不可能，而无产阶级出生的人也能进入政治，分享权力。另外，政府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在德国，俾斯麦引入了旨在减轻工业社会带来的各种危害的社会福利措施。在马克思死后不久，恩格斯随即不止一次地认为在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宪政措施，而非暴力斗争，来取得权力。另一个未曾预测到的因素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巩固。马克思认为阶级而非民族才是历史的真正行动者——他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Marx and Engels, 1962, I, pp. 21 – 65）革命的驱动力则来自国际劳工协会。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社会主义在 1914 年成为欧洲的一大势力。但当冲突来临时，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投票支持（本国政府加入）战争。虽然诞生于法国革命并为马克思所改造的传统的国际主义观点将继续存在，但社会主义本身却分裂了。

1917 年十一月发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则转而将解释革命的权力赋予了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狭义的阐释——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模式。这一模式，虽然是源于马克思主义

革命与反革命

模式并自称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惟一正确的阐释，但却存在许多和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因素。社会革命还是被视为是民众意志的产物；革命的合法性还是存在于其代表无产阶级愿望的事实上。消灭资本主义的必要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必须先发展起来——同样也得到了保存。俄国的状况与马克思所看到的状况是如此不同，以至于马克思的模型中许多内容必须被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并未经历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除非我们称 1917 年 3 月推翻沙皇统治的、被称做二月革命的革命被算成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即使这也是对历史进程的一个很大的节略。因为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革命不止是权力在物理形式上的转换，而且还是只有在封建阶级生产力被耗尽之后才能发生的。

第二个问题是自发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其面前的法国革命模式中得出明晰的结论：革命是自发的群众起义。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以及巴黎公社，都有大批民众加入运动，寻求旧政治的终结和经济转型。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及其他人的更为保守的观点不同，认为仅有自发行动是不足以引起革命的。他声称，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但它是一个组织起来代表无产阶级愿望、代表其行动的政党的产物。（比较 Lenin, 1968）除非它们也被组织起来，否则欧洲其它国家的革命也不会发生。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声明本身有许多含糊之处，至少对于那些还能记起 1917 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人们来说。舍格·埃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随后将攻取冬宫

改编为成千上万的工人的集体入侵，而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两百多名经过训练的军人的有纪律的军事行动。而在拍摄电影过程中伤亡的人数超过了当时真实事件发生时的人数。然而，人们记住的往往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神话。

第三个问题则是革命之后将发生什么。马克思不可避免的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含糊。他所认为的革命之后将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其后来的阐释者们所思考和争论的那么清晰。在1848年“专政”一词并不具备我们今天赋予其的无法减轻的消极内涵，大多数人还是视独裁者为罗马模式中的紧急状态下被赋予了依照国家利益行使全权的一个或几个人。当然，马克思并未将其视为是一个人的统治，而是一个阶级的集体意志。恩格斯将其比作巴黎公社的政府。在俄国，和公社等当的是苏维埃，或地方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们在沙皇下台之后那段剧烈的时期一直高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然而，一旦大权在握，列宁不浪费一分钟，就使苏维埃的意志服从于党的意志——后者的“领导地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首要的独特的原则，虽然这一原则直到1977年才写入宪法。这样，党才是社会革命连续的受益者。

革命旨在推翻一个阶级，同样，革命还导致所有阶级的消亡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但是现实主义者们却发现类似阶级在苏联还是存在着。虽然斯大林认为随着资产阶级被消灭，只剩下两大非对立的阶级：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工人阶级，以及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他们虽然不被认为是一个阶级，但实际上成为了苏联社会的统治阶级。这些都被一

个稍晚的观察者，吉拉斯（Milovan Djilas, 1957）所揭示。他提出，由于掌握着权力，南斯拉夫共产党不止看上去像一个阶级，而且实际上确实成了一个阶级。他认为，一个统治阶级进行统治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不同于已往的统治阶级，共产党并不直接拥有生产资料，但事实上却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管理着它们，并因此而取得了其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意识和特权。

吉拉斯在一个关键时刻提出了他的看法，当时苏联共产党对其他共产党的权威正受到铁托的成功挑战。列宁并未反对马克思广泛的国际主义观点，反而将其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种武器。由于其后继者斯大林本人缺乏对外界的知识和理解而只顾提升国内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的权力，这种取向被确立了下来。但其他欧洲国家却显得不怎么喜欢，而且事实上也不怎么理解苏联所处的位置，而寻求通过在中欧小国间建立撒尼太雷警戒线（*cordon sanitaire*）将苏联孤立在世界事务之外。通过诉诸传统的国际主义而打破这种孤立的尝试得到很少的响应，而20世纪30年代成立的人民阵线政府却成立太晚且由于各方的互相猜忌而没有留下任何持久的东西。斯大林愤世嫉俗地与希特勒结盟可以被视为斯大林的治国术。但这并未赢得任何朋友，而绥靖政策取得的时间也被浪费掉了，但也因此而取得了不少教训。二战后，在占据了东欧的苏军支持下，斯大林成立了一个相对立的撒尼太雷警戒线，把资本主义拒于门外，严防其影响。只有在南斯拉夫，铁托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们建立了独立于苏联红军的政权，而这也是惟一一个能挑战且成功地挑

战了斯大林霸权的地方。

除红军之外，斯大林将革命自上而下地加诸东欧的最大盟友是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个观念。人们普遍地认为革命即将发生，因此当变革来临，人民民主党成立时，这些都被视为是革命的产物。东西方的人们同样普遍相信，按照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观察，革命一旦发生，就将是不可扭转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被阻止、先占或颠覆，但无产阶级革命则不能。对找到革命原因的适当的理论解释的抵抗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才有人对革命不可避免的假设提出疑问，而且里根在 1981 年提出“把共产主义的前线击退回去”时的热心并没有多少人当回事。当然，政策具备理论上的可行性是一回事，但能否真正实施又是另一回事。里根缺乏实质上能使政策有效的许多物质条件。然而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苏联内部及其和东欧盟国的关系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掩盖了美国政策无力的真相。所以，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本应在欢庆里根的胜利的人们实际上却在沮丧地警告说事实上并未发生任何变化——或许，我们只有在华盛顿才能看到最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里根本人也用美国的传统自由主义观来看待革命，认为革命是生来自由的人民运用武力推翻专制政府的行为。美国的独立宣言更进一步：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

革命与反革命

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里根认为尼加拉瓜的反抗运动“在道德上和美国国父们是一致的”，但这并不这意味着他具有一个像看起来那么简单的革命观。表面上，他只不过是在简单争论说，反抗运动只不过是尼加拉瓜人民的合法代表们正在用武力行使杰斐逊所宣称的改变和废除他们国家的旧政府的权利。然而区别于美国革命，这个反抗运动是由外国势力发起、并提供人员训练和资金援助的。而且他们要推翻的政府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专制政府或者是殖民政府，而是一个尼加拉瓜人民自己通过发动反对一个长期专制独裁政权的起义而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假如杰斐逊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还在世的话，他肯定会站在沙蒂尼斯塔人一边）

里根的问题是，独立之后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发展起来了：自由主义者视革命为变革政府的合法方式，而保守主义者则视之为由小群人们从一个腐败国家传到另一个腐败国家的传染病。他无法接受沙蒂尼斯塔人的政府是一个合法政府的说法，不是因为他们上台的环境，而是因为害怕他们会在当地以违背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并和苏联结盟。然而依据对涉及革命的团体的定义来判断革命本身是好是坏在逻辑

辑上是矛盾的（然而，并没有一个高官因为这种逻辑不一致而被认为是不合格的）。限于杰斐逊提出的人民具有行动自由权力的假设，里根只能通过指责沙蒂尼斯塔人并非是尼加拉瓜人民的合法代表——因为他们未能建立一个自由政府，来逃脱这一两难困境。（而理论上）如果不是反抗者而是沙蒂尼斯塔人才是由类似殖民主义权力支持的外国势力的话，那么，推翻他们是正确的。传统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民有权选择任何他们喜欢的政府类型，但新自由主义者却认为可接受的政府类型必须满足一些自由的形式上的标准。实际上（里根的）这场争论因为另一个原因——我们不再是生活在18世纪70年代，而是一个必须考虑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今天——而失败。但是新自由主义革命模型提出的革命必须满足一些特定的形式上的标准才能为人们所接受这一点，却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甚至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以勃列日涅夫教条的形式而拥有支持者。

总而言之，所有革命模型都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

首先，革命是突发的。所有社会缓慢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都能，且确实引起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它们都不是革命。

其次，革命是暴力性质的。所有政治系统最终都依赖武力的运用（学术上称为“物质强迫”），而且在定义上政治系统就是享有对物质强迫手段运用的合法垄断。但是在革命中暴力并非最终的手段，而是保证变革进行的关键手段。所有被广泛认可的革命都伴随高度的物质暴力。

第三，革命是政治演替。它要求一个统治集团为另一统治

革命与反革命

集团所取代。因此，革命属于那种其本质需要在发生之后才能被确定的事件。任何旨在推翻政府、掌握政治系统、进行带来长远影响的变革的不成功的尝试都不能算是革命。（实际上有一种亚类型也能称为是革命：统治者通过运用其运用武力的能力，去除加诸其身的宪法的或制度的限制而取得对权力的无约束的运用。即使这里还包含着人事上的重要的延续，但统治集团改变了。一个例子是著名的政变，1851年12月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崩溃，或如马克思所命名的——再次有意识地与1789年法国革命相比——“路易斯·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革命”。）

第四，革命是**变革**。如果没有什么变化，那就也不是革命。但对于革命之后将发生什么变化、或多大变化却基本没有共识。变革的本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主导的，因此革命是一个本质上充满争议的概念（Gallie, 1955 - 6），也就是说，一个在定义上就是不可能有共识的概念。

在何处、为何其他概念更被看好？

革命这一概念由于其内在争议性的特性而被一些学者所摒弃，而采用其他一些他们认为更有意义的或更“圆滑”的概念。之所以选择这些概念是有其正当理由的，而它们与革命概念之间的关系则自然是由研究的目的确定的。

20世纪历史上的许多革命都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革命。这个古怪的、认为只有共产主义分子才能发动革命的信念并不能

归功于马克思或恩格斯，因为他们二人都认为如果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具备革命条件且最适合进行革命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相反的，这一信念是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后的冷战的众多产物之一。两级对立模式的世界使马克思主义的假设内化于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心中，他们以为世界已经开始真正地变革，而变革的惟一方向就是早已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认定所有政治变革都是革命，所有革命都是共产主义运动，西方的决策者们成功地阻碍了一些必要的变革。而在一些地区——最著名的是印度支那和原葡属非洲，由于人们将自己视为是受殖民压迫者，而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最终胜利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革命”这一术语包含的意识形态假设使得 20 世纪 60 年代的许多作者尝试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中立的概念：“内战”（见 Eckstein, 1964），来指任何形式的国内武装冲突。“内战”是一个有用的、有效度（valid）的概念。国际社会原来在法律上定义战争的主体是外交上被承认的统一的国家，它们适时授权（进行战争）给其代理者而进行的一种活动。现在却需要面临各种形式的非常规战争，这些战争为“战争状态”这一更泛化的概念所包含——这一概念不涉及对合法性的判断、对所追求目标和所运用手段的评价。同样，还能确切地将内战与发生在一国境内发生的武装冲突（这种冲突非常广泛）区分开来。它们一般都没有很明显的开始和结尾，而且多数没有政治意义上的结果。如果没有造成政府的更替和社会变革，它们也不能算是革命。因此，从一个政治学家的视角来看，

革命与反革命

“内战”一词在消除了“革命”一词所包含的政治重要性的同时并未带来其他认识上的重大收获。同样，这种情况同样适合顾尔（Gurr, 1970）及其追随者们试图建立一个预测性模型而提出的“骚乱”（turmoil）一词。另一个替代性概念“政治不稳定”则在关注政治的同时排除了军事的泛音（overtones）。但这也只不过是一个听起来简单的术语，实际上也将遇到一系列难题，这些难题将在后文一一论述。

可见，革命是一个复杂的术语，至少包含四个方面（Calver, 1976, 1970b）。首先，它指一个过程：一些重要集团不再留恋既有政权，并转向反对这一政权的过程。其次，它指一个事件，一个政府被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而推翻的事件。再次，它指一个计划，新成立的政府试图改变它所要负责的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计划。最后一个但并非最终一个方面，它指一个政治神话，讨论的更多的是应该是什么而非实际上是什么。由于每个方面都在起因上和其他几个方面相互独立，因此其共同的因素是第三个方面——事件，只有通过观察是否发生了这一类事件，我们才能判断是否发生了革命。

在一些革命中，确认出关键性事件看起来非常简单：1917年克伦斯基政府的倒台，1959年巴斯迪亚坐飞机出逃——这些都是独特的且决定性的。但是法国革命的决定性事件是什么呢？毕竟，伯克早在路易·卡普特被拖曳于巴黎的街上，最后一次走向断头台的三年前就正确地认定这是一场革命。但是答案并不复杂，国民会议的召开是一个转折点、国王被处死是又一个转折点，这两件事和其他事件——罗伯斯庇尔的下台，热

月和雾月十八政变——一起构成了我们称之为法国革命的一系列事件。每个事件都为不同势力之间的重新结盟提供了机会，而正是这些不同势力间的结盟决定了后来的社会改革进程。

在伯克称 1789 年的事件为法国发展的倒退的同时，托马斯·潘恩和其他许多人却欢呼雀跃，视其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进步。怀抱着“时代的新秩序”这么强烈的一个信念，哲学家兼科学家孔多塞于其在监狱里待审的时候，描绘出了一个人类发展的大纲。罗伯斯庇尔下台了，而由于热月党人的反动来得太晚以至于无法救出他来，但他的人类进步不可扭转的信念却存留了下来。对革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来说，一旦变革力量被释放出来，就将不可抑制也成为革命神话的一部分。

但这并非事实。反革命并不是与革命截然不同且相互对立的，反革命本身也是革命。运用武力是每个掌握武装力量的人都能做的事情，而不幸的是武力更经常的是为那些不愿意、痛恨，乃至坚决反对革命这个词日常含义中所指的迫切需要的变革的人所把持。政府可能因为来自左派或右派的挑战而下台。带来进步的革命性事件的后果，和从事改革的政府一样，都可能造成威权主义独裁的上台，并组织进一步变革。20 世纪的历史的最大教训是这些独裁者做了太多此类事情，而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时刻的政治的最大任务是重塑宪政变革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的信念，并找到阻止赤裸裸的利己主义通过武力掌握政权的各种方法。

研究革命的各种困难

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研究某种社会现象的人们总是被视为是支持这些现象的。没人会说一个地质学家希望地球上满是火山，即使对于那些我们认为对坏天气过度兴奋的那些气象学家们，我们也不至于认为说他们是为了促进风暴的产生而工作。但是一个试图研究革命的人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他或她动机的怀疑。很明显，那些为政府安全部门研究社会现象的人是不客观的，这容易导致他们工作中产生严重的错误。

从革命的本质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易于研究的对象。革命是突然发生的。一次又一次，我们认为会导致革命的情形却往往并没有产生真正的革命。而有时候却突然的，不知从何处冒出来革命性的变革，颠覆了一个看起来很稳定的国家。“可预期的反作用”这一适合于其他社会现象的规律同样适合于革命：我们越是期望、害怕或渴望某种东西，它就越可能更少地完成其支持者们分配给它的那部分任务。

革命还是秘密的。奇袭对将要发生的革命或计划发动先发制人的罢工的政府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战略优势。革命并非必然是共谋的，但必然包含共谋的成分；革命形式上不是军事的，但所有的革命都依赖于武装力量的忠诚。关于革命早期的、预谋阶段的材料必须事后被拼凑在一起，而这往往由一些热衷于宣传某个观点的人来从事的。因此，研究者并不能保证能收集包括重大事件在内的革命进程的各个方面材料。

革命是**复杂的**。即使是最好的观察者也只能看到其中一小部分。那些报道当代革命的人往往都是职业记者，而他们的任务是尽量覆盖许多国家的很广范围的事件。这类人从定义上看就知道缺乏研究革命所需要的专业培训。最坏的情况是，覆盖性的报道可能是那些接受了完全不合适的训练的人做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世界媒体对 1968 年的墨西哥的报道，当时主要的记者都是那些在报道奥运会的体育记者。他们看到了一个微妙的政治局势，却将学生和政府的关系视为运动场上的竞赛并加以报道，这部分地促成了最终的灾难性后果：特拉提卢卡（Tlatelolc）大屠杀。当地记者在这种环境下是不可能以这种纠正性的方式报道的，一方面因为他们居住于本地而易受地方政府的迫害，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报道总会被修改以符合其国际同行的假设。

历史学家拥有一个优势，通过另外一些训练过的观察者——外交家，而在多年后还有进入现实的通道。由于其惟一的任务是为其母国提供各种信息，因而他们的报告是秘密的，在帮助勾勒出革命原因和结果的精确图像上具有很高的价值。历史社会学家要完成过分苛求的任务：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任务结合起来完成——利用历史学家检验、评估、补充源于特定来源的资料的不足等技术，运用社会学家对证据提问以拓展和提升我们对革命这一客体的认识的技术，历史学家往往不对这类问题感兴趣。与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说的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社会学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值得尊重的分支（相关论述参见 Eisenstadt 1978. Hall 1985, Mann 1986, Mouzelis

革命与反革命

1986, and Zeitlin 1988)。而且，对于革命来说，历史的方法是惟一的方法，当然也是惟一可能给革命的这一复杂进程的各个方面以适当分量的方法（见 Zagorin, 1982）。因为，如上文所述，对于那些赞美或害怕革命的人来说，革命的本质在于其处于世界史上重大变革发生的转折点上。忽略了尚未有一个合适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就说明社会学并没有做好去提出，先不说回答，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的准备。

最后，革命的范围和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测量。社会科学家们正确地要求对测量的精确性和数据的兼容性格外注意。然而，此处，数据不是由分析家而是由许多观察者所决定的，这些观察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稍微与众不同的观点。因此，每个观察者都不是简单记录下他们所看到的，而是都在通过两种方式尝试将可获得的信息组合成一个更完整的模式：一种方式是从其所见中推测其所不见，另一种则是寻求他人的观点，改变自己的观察记录以与共识相接近。因此对这样的数据进行清理乃是分析者必须具备的训练。

研究者们自身同样也会受流行的革命理论模式的影响。譬如说，1948年，在激进的自由主义领导者乔治·伊利亚瑟·盖谈遇刺之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发生了暴乱。刺客随即就被处死，因此我们无从得知其动机，当时参加暴乱的人也未必知道。但是在对于此事一种过热的怀疑气氛中，“美洲国家组织”的代表们在会议中认为暴乱是共产主义煽动者制造的。这样的一种论断随即成为当时的一种正统论断，而不论是否完全没有证据证明或反对这样的论断。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者必须学会从

过于复杂的解释中提炼证据。

很少有观察者受过精确观察大众性事件的训练。即使是非暴力的民众示威，其组织者和警方提供的人数统计往往存在显著的不同（组织者说有近 50 万，而警方认为只有不到 5 000 人）。然而，测量的困难往往被夸大；参加者的规模并没有示威持续的时间、目标以及参与者的心态来得重要。在这一领域及其他领域，测量什么、如何测量这一问题是由所要求信息的目标所决定的。假如你问到“绳子有多长？”那么你得到的答案可能就是“绳子如它所长那么短”。

因此，总而言之，我们所观察到的受我们认为我们在观察什么的想法所左右，而我们测量的是我们认为对我们有用的。许多 1979 年伊朗的观察者们当时无法认识到事件的真实面目：他们所认为的不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革命的事件却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扫除其国内西式现代化、建立神权国家的。他们不这么推断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理解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而是因为对他们所能观察到的现象的一个预设——其中首要的预设是一对伴生的信念：在 20 世纪末期，宗教不可能为社会革命提供组织性的意识形态；经济现代化本身作为一个好事，会消除各种革命发生的可能性。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嘲讽：当我们在欢庆法国革命——这一革命的神话很大程度上巩固了西方文明中的这两大信念——爆发 200 周年的时候，伊朗的神权政权还在台上，而且像法国革命的革命者那样，它的领导人正试图通过威胁处死或毁灭其反对者而在全世界推广其意识形态。

第二章 阐释

阐释革命

那么，我们所观察的革命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首要的问题是，革命是一个社会过程。因此，“现实”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是由测量的全面的、抽象的标准决定的，而是由这一过程对参与者或观察者的相关性所决定的。因此一些人认为“实际上”并不存在革命。革命并非一个或一系列事实，而是一个主观的建构，一个个人心智的创造物，而非客观存在。

这一争论直接把我们带入了社会科学中的基本争论，即许多人所谓的从实证主义撤回的问题之中。“实证主义”自身就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术语。一旦一个人类知识所创造的理论将社会现象等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理现象那样的有秩序世界的话，这一理论也就成为社会能够而且应该按照科学标准进行客观研究这一观点的应用了。那些被视为实证主义者的人

(少数实证主义者，包括大多数滥用这一词汇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一术语很好地适用于他们)认为事实之间存在可客观测量的差异，而价值只不过是偏见。这一观点现在受到了严重的攻击。事实和价值的区分，由于词语本身的双重性——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评价性的——而模糊不清，更缺乏说服力的是，在某些时候无论如何并不能做到对事实和价值的实证主义的区分，且实证的研究本身也被否定。在这种环境下坚持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科学解释意味着冒被贴上“经验主义者”——甚至更轻蔑的称呼——“幼稚的经验主义者”的标签。

对实证主义的攻击及与其类似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经验主义的攻击，都是在攻击社会科学的理念。当然，对社会科学的攻击古已有之。保守的人们很不喜欢这一概念，有的甚至拒绝接受这一概念。譬如在牛津大学，社会“科学”被淡化为社会“研究”(study)。其他一些人则成功地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改名为看上去更确切的、商业导向的“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我们应该记住，培根 13 世纪在牛津大学教授化学，并由于其轻率行为而被教会判处单独 17 年禁闭。而如果剑桥大学对当初牛顿做出同样的处罚的话，人类可能至今还在犹豫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社会科学概念的哲学意义上的反对是基于对构成社会科学的基本要素过于狭义的理解。很明显，他们并未认真考虑“科学”对于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哲学家来说含义是不同的这一事实。将科学方法用于社会的第一个难题在于，社会并非由无生命的客体或有知觉力的人构成的，而是由非理性的、能够互

相交流，对其境遇进行反思的人构成的。这又将我们引向其他两条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站得住脚的推论。

第一条推论认为由于人类具有推理能力且经常不理性地行事，因此他们的行为永远不能被完全预测。这应该没有任何错误，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却并不尽然。硬科学，譬如物理学（硬科学的理想典型），处理的是物理世界中完全可预期的事物。从理论上讲，一个物理实验可无数次重复，而每次得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而对社会科学来说，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这样。然而近年来这个方面却发生了变化，虽然社会学和政治科学并未变得更“硬”，但物理学却变得越来越“软”了。在亚原子的层次，海森博格的不确定性定理认为我们不能确切地预测未来的行为。而且，看起来，不确定性似乎遍布在宇宙的每个结构中。但在实践中好像并非如此，对于对我们有（日常实际）意义的层次来说，传统的可预期的说法还是可靠的：开关被闭合，电动机开动，电光亮起，咖啡被过滤。

第二个推论则认为如果社会本身会受到理论化的结果影响的话，对社会进行理论化并不能做到价值中立。这一批评，就像波普（Popper, 1957, pp. ix - x）对不可预期性的证明一样，是基于一个暂时的谬误。只有当理论化的结果足以通过扭曲分析的程序而影响用以分析的物质时，才可能影响到价值中立。由于从定义上来说，理论化的结果只有在理论化之后才能得知，因此价值中立不可能被影响。然而，虽然理论上存在可能性，但实际上未来的行动者们能完全理解既有理论知识是不大可能的。

一个更实质性的反对意见则认为对社会进行理论化并非专家独占的领地。我们每个人都在观察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理论化，并建立如何行为的假设——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化”。那么，我们是怎么形成关于社会客观的观点的呢？答案很简单：我们问别人。我们问的人越多，我们对世界的观点越可能接近价值中立。很明确，我们永远不能做到价值中立，但是我们能接近它。而我们努力寻求客观性的事实则加强了客观性对我们的认识框架的核心重要性。

使得对社会科学的攻击变得有效的，并不是诸如文奇（Winch, 1958）和麦金泰尔（MacIntyre, 1983）等哲学家们的自身就有问题的一些意见。而是“科学”这一概念本身受到了攻击，其中最著名的是库恩（Kuhn, 1970）。而他的攻击被那些不相信“社会科学”这一提法的、害怕这一提法发展起来将会使人类的命运被其他人所控制的人们所极力提倡。现在，科学家们并不被认为（虽然是被非科学家认为）是在做别人认为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并没有、也不能建立一套基于观察、实验和推理基础上关于物理世界的价值中立的观念。首先，其批评者们认为构成“科学”本身的要素就是由社会决定的。科学家们并不能研究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他们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工作——他们需要研究那些被认为是有社会功用的问题，否则商业部门和政府部门都不会提供研究资金，至少他们不会有意提供。因此，科学家们所做的都是有价值导向的。

科学家们研究的过程同样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公正和可靠。即使实验方法是可用的，他们也不能证明一个命题是正确

革命与反革命

的，而只能证明其他命题是错误的。而且，即使“正确”和“错误”的概念也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们普遍接受一个世界观和科学界基本观念的框架作为其研究工作的前提预设，这个框架，他称之为“范式”（paradigm）。因此，科学家们是在主流范式的指导下工作、从事库恩（Kuhn, 1970, p. 10）称之为“常规科学”的研究的，这种对标准化程序进行重复的工作在一定范围那被认为是对社会有益的，但并不能对主流的观念提出挑战。当新的证据积累起来并形成对正统观念的挑战时，他们并不拒绝正统观念；而是努力使新证据适应于旧范式，即使这样最终需要借助于详细的且不正当的借口来辩解。一个例子是由泰柯·布拉赫（Tycho Brahe）和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创立的一套详细阐释的天体循环运动理论，用以解释为何实际观察到的天体运动和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论并不相符。在这个例子中，当且只当调解最终破裂的时候，一个新范式才能被接受，一个“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才能发生。可能在这点上科学家并不像政治家。政治家们同样发现，一直到长期观察而积累起来的压倒性的证据显示事实并不符合假设，他们都无法拒绝一个主流范式（譬如说，冷战）（Shafer, 1988）。

这一观点和我们早已提及过的语言和社会现实的关系相一致。研究者们脑子里存在的范式模式意味着这一领域的词汇表将由范式来表达。譬如，早期的有关电的观念，都认为电就像流动于管道里的水一样，是流动于金属线中的流体。而任何电器工程师都会告诉你，这个观念不仅不是一个有用的类比，还

会导致误解。

当然，我们必须接受社会现实包含语言本身及其符号层面。语言是以符号为介质并因此是由符号构成的。政治语言并非中立的媒介，而是一个以特定方式引导思想的观念和意义的结构。但是政治的关键是调解争端、运用权力分配资源。政治议题不是确定谁是对的，而是确定谁在什么时候，如何得到什么。通常说来，语言并不一定总是人们隐蔽其思想的媒介，但对于政治语言而言却是如此。政治学里面的许多核心术语都是在本质上相互竞争的概念，这些术语的重要性在于不同的人对事物的“真正”含义的阐释是很不同的。这些对其意义的争议对概念的价值十分重要，因此，现有的认识是含糊不清的。科学家们寻求一致，而政治家们寻求隐藏不一致。很多人会同意，“革命”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对于那些支持它和反对它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这些概念具有多大价值取决于实践——个人和群体尝试结构化其思想的方式。概念本身是模糊不清或有争议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确定的、无争议的概念不可能存在。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其和科学做类比。曾经有一段时间，科学中并不存在界定了含义的概念，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完全专用的词汇表，用以表述描述物理过程的词语的精确的、取得共识的意义。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定义概念，赋予其固定的含义。因此，社会科学也能给概念定义，赋予其大家能达成共识的含义。而这一工作实际上已经由国际政治学会开始着手实施了（唉，虽然尚未完成）。这种用以避免价值混淆的人造词汇的一个例子就是前文

革命与反革命

已提及过的“内战”。

关于“革命”与“反革命”之类现有术语的含义之争，并非一个能得到解决（实证意义上）的问题，亦非一个完全不确定且永远不能得到解决（后经验主义意义上）争议。实际上，后一种看法远非哲学诡辩，会使得我们远离启蒙，退回神学辩论时期的枯燥的消耗和中世纪的文化停滞。接受它就是接受命运而非理性作我们的引导者。然而，不论对于哲学批评来说，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么的令人不满，但它确实能够运作。人类通过运用自然哲学而到达月球，通过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而在不能达到几何学要求的严格的确定性的同时，精确且实用地做出一系列大致估测。

许多人认为如果不能进行实验的话，就不存在科学。但天文学和气象学（由于规模和距离的原因），以及药理学（由于伦理的原因）并不能按传统的形成假设、进行实验检验的模式进行。但这对于我们的科学认识和（最终是）日常生活而言都是具有实质性重要意义的。如果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认为它们不是“硬”科学的话，我们会因此丧失许多对我们所生活的宇宙提出根本问题的机会，而疲于应付琐碎问题。很明显的，这同样也适用于社会科学。人类正当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人自身。而假如我们只能在概率意义上确认什么，那么这些概率累计起来，也能够形成用以实践的精确性。

然而，社会是人类的构建。我们必须承认——乃至断言，正如电之不同于水，社会也有其自身不同于自然世界的动力。举例来说，就我们所知，政治是一种确定由谁来行使分配稀缺

性资源的权威的方式。但是，正如宗教和体育，政治也是一种构造时间、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方式。这一构造的结果是：社会是有秩序的，社会的可能性总是有限的。对于个人来说，理解社会只不过就是理解一个由各种角色构成的很小规模的剧目。举例来说，我们确实无法在摄取食物的意义上理解进餐的社会意义。进餐能够表现出家庭的团结或冲突、欢乐或悲哀。但是我们在大多数进餐的时候所做的基本的事情就是吃饭，并在此过程中养成了某种习惯，这些习惯深入下来，形成了我们的本能。政治也是如此。理论上说有许多需要做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想实现我们的目标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其中许多目标并不能达到。而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这些角色并非独立存在的：譬如说，哀求者的角色就意味着存在送礼者。而社会的本质就是一个打算从事某一角色的人往往会发现和他打交道的那个人正在养成另一种类似角色。每个人都在需要扮演某一角色之前就已经在社会上学会了这一角色。这意味着社会境遇的无限可能性（以及无限危险性）被纳入了可预期的模式之中。因此，后经验主义者们会发现，举例来说，当它们要食物的时候，别人会给他一些能吃的东西；而当他问路的时候，别人却不一定告诉他答案，因为道路的概念是有其社会含义的。他问路的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别人指给他的路是由给他指路的人的需要决定的，而非他自己想要去的目的地。

政治就是在扮演着不同的定义好角色的人们之间解决冲突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一种戏剧。所有政治事件，包括革命，都是在社会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其中许多象征性的战略都被运

革命与反革命

用以实现各种目标：创造团结、赋予程序以意义、煽动激情、激起行动、乃至发誓下咒以鼓动大众对股市将会走牛的茫然的信心（或信念）——实际上并未走牛。

革命被广泛地认为是所有社会现象中最具戏剧性的。法国革命的一个特殊的后果是将法国推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之前她刚刚在七年战争中失败，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有过不体面的表现。欧洲其他地区的许多人都在怀疑她能否能应付那些启蒙了的专制君主们所代表的现代化的挑战。革命由那些扮演了他们从古罗马神话和历史中学到英雄角色的男女们所领导，并被有意识地注入了新古典主义的精神，他们试图将这场革命变为世界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事实上它确实成为了转折点：革命的事件和过程可能还需要合理的争论，但革命的神话却不会消逝。法国革命给法国带来了一个强大的专制者，并在拿破仑战争的战场上浪费了许多年轻人的生命。但革命也给法国带来了荣耀，正如阿纳托·法兰西（Anatole France）《企鹅岛》里的一个人物讽刺法国历史时说的那样“荣耀的代价从来不会过高”。

伟大的革命始终是下一个伟大革命的驿站。今天列宁涂着防腐剂躺在他的陵墓里，而陵墓外的街道和广场上却正涌动着新的潮流。卡斯特罗今天还在扮演玛伊斯佳山里的年轻司令官的角色，虽然他已经六十高龄、穿着一件衣不蔽体的破制服，且不再抽他那著名的、曾经在美国用来表示生殖器的雪茄。丹尼尔·奥特加（Daniel Ortega），诗人和尼加拉瓜的总统，在和经济混乱作战——美国政府曾多次参观过他不幸的国家以寻求

其独立的民主化之路。纳赛尔逝世已经很久，而葡萄牙革命的激进领导者在监狱里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同时，在德黑兰，阿亚托拉·哈梅内伊（Ayatollah Khomeini）的死是狂热的哀悼活动信号；八个人死于为了接近灵车而发生的冲突中，数百人受伤。他被西方媒体称为是本世纪（20世纪）里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设想的人里面最成功的一个。一个电台记者将其比作希特勒、阿塔图克（Ataturk）、纳赛尔和大卫·本-古里昂（David Ben - Gurion）。没人能举出一个比他更惊人的关于当今的西方文化相对论者，或者做一个更困惑的对比。阿塔图克、纳赛尔和大卫·本-古里昂是很不一样的人，而且都很难对付。但每个人都是他们所确信的代表人类进步信念的革命的领导者——这一信念如果不是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制造出来的话，也是由其促生的。而我们发现，正是进步这一概念使得革命近两百年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在他临死的那个晚上，美国革命之后的50年，杰斐逊写下了可视为是他对那场他参与领导的革命的最后一个深思熟虑的观点。这段话比一个概要更能说明他对什么构成进步、什么不构成进步的看法：

世界将会如此——我亦确信世界将会如此（某些部分快些，其他部分慢些，但最终将遍及所有），觉醒的人们挣开枷锁——这一修道士的无知和迷信劝服他们用以限制自我、相信自我统治的庇佑和安全的枷锁。而我们代之以这样一种形式：恢复无限制地行使

革命与反革命

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自由权利。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人类的权利。科学之光向所有真理的权力开放，普通大众不再在出生之时就背负马鞍，而少数优越者也不再穿长靴、带马刺，注定在上帝的光耀下合法地统治。

(节选自 Butterfield 1959)

用这些标准来衡量，1979 年伊朗革命及其政权——人民恭顺地交出了其来之不易的自由权的宗教专制政权，是人类历史的，尤其是妇女历史的一大退步。哈梅内伊的专制看起来摧毁了国际法的基础以及诸如言行诚信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是四个世纪的国家间战争的产物，而代之以师阿 (Shi'a) 原教旨主义宣扬的终止人类进步的刺耳尖叫 (比较 Popper, 1962, II, ch. 24)。幸而我们还能相信，如杰斐逊所言，这些观念在将不能长存。然而，与此同时，对许多人来说，如果伊朗革命确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那么革命的概念将不可挽救地失去效度。

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伊朗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衡量出在西方社会的世俗化如此泛滥之际，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能事先认识到传统宗教势力还能如此强大。在另一种意义上，这又是一场反革命，而这只有在进步概念的框架之下才能显示出——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没有技术性的区分；对现有事务状态的认识过程是类似的，攫取权力的机制是一样的，只有随之而来的施政纲领不一样。而且区别并没有多大。举例而言，英国的平等派，从过去英国尚未受诺曼人统治的乌托邦时期寻找灵感。卢梭的弟子们认为人本质上是平等的，君主制结构代表

了一种失常。布尔什维克们则将首都从彼得大帝的通往波罗的海的出口迁回莫斯科。一次又一次的，在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之时，人们总是返回理想化的过去去描绘未来，这个未来往往是复古。在这个意义上，阿亚托拉（Ayatollah）的伊朗，妇女藏身于“卡多”（Chador）中，渎神者和同性恋者被处死，这同样也是一种复古——回到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中（never-never-land）。因为历史经验显示，当伊斯兰教如此之时，正是其衰弱之际。在其权力的另一端，当其是一个世界宗教且人们战栗于其军威之时，哈里发们则生活于声色犬马之中。

分析革命

我们已经说过，对同一个革命的许多不同的观点都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不同的观点而非现实。法国革命期间所发生的事务，远远超出一个大脑在特定时间内所能把握的。因此，表现法国革命的任何图像，都不可避免地只是选择性的。然而此种选择性并不等于分析性。此处，“分析”有其特指的涵义：将事物的总体分解为一些更小的部分，从而能对这些部分进行更细致的研究。而当这些细致的工作做完，且支配该进程每个阶段行为的本质的普遍原则确立下来，我们就有可能将其重组为一个现实的全面完整的模型。因此，第二个问题并非是我们没有做这些分析工作，而是我们无意识地做了这些工作，导致许多未阐明的前提假设被用于整体性分析，而这些前提假设可能会使分析逻辑涣散，甚至误导分析。只有当

革命与反革命

我们在分析一个公认为具有主要的社会重要性的现象的时候，这种危险才不那么严重。但是对于许多作者来说，一个现象的重要性要放在总体中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我们经常发现，作家们在论述革命时往往不愿或不能运用他们经常用于分析其它社会现象的重要技巧。

因此，把革命作为一个现象进行系统分析，是社会思想的一个最近的发展。而事实上这是一个嘲讽：从实证主义撤退会阻碍精确训练的进步，而（精确训练培养出来的）政治风险分析者运用早已掌握的知识服务于工商业。在广受欢迎的、详细分析单个革命的每个组成部分的早期作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包括论述法国革命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966）、分析俄国革命的索罗金（Sorokin, 1925）。与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一样，他们更关注革命的起因与结果，而非具体构成事件。与他们中多数人不同，他们也寻求从所分析革命中归纳出普遍结论，这些结论对其它国家的其他场合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对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比较再一次刺激了对革命进行第一次比较研究，然而此处的两个假设明显地很快开始为后来的论著定下基调。一个假设是，革命主要的是——或者说应该是——观念的而非实际事件的。一场真正的革命涉及到学术的重要话题；而未涉及的时间则缺乏同样的重要意义。因此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把他们的，以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伟大的社会革命而置其他类似现象而不顾。法国革命制造了几书架的书以及得到学术界权威承认的自己的学术性期刊。英国内战、美国独立战争，以及俄国革命也得到了类似的待遇。而相

反的，对墨西哥革命——观念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不同作用（在某些人看来更小的作用）——的研究则更多地留给了墨西哥之外的，主要是美国的一些区域研究专家。了解古巴革命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仅能揭露权力现实的部分面貌，而且还能解释 1961 年之后发生的许多事件。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问题始终还是一个高度争议的且亟需研究的问题，即使事件本身是最近发生的、许多重要的见证者还在世，且革命本身也受到了世界媒体前所未有的详细的关注。古巴人传播了一个神话，而美国人则传播了另一个。而越南、伊朗、尼加拉瓜和阿富汗发生的事件同样对世界政治的话题很有意义——不仅是其有准确的历史资料，更非是其对社会科学理论的作用，而是作为聋者间对话时的口号。

事实上，对英国、法国、美国和俄国过去所发生的革命的集中关注，还产生了另一个奇怪的假设：这些给世界的面目带来了巨大变革的伟大的社会革命，都是很特殊的，以至于它们不能被纳入一个普遍理论的语境中，除非那个理论是基于这些革命的。佩蒂（Petee, 1938, pp. xi - xii）清晰地表述了其观点：

我没有对小的革命事件多花费笔墨。从伟大的革命到诸如麦克白谋杀顿肯的宫廷革命中，每个人都能列出一系列大小不一的事件。但只有那些重大的事件才能给我们一个估量每个因素的重要性机会。显见的社会体系中的潜在因素可能会在一个局部革命中扮演

革命与反革命

重要的但非决定性的作用。在不同的危机中，社会可能会在其某个组织的轮轴处发生紊乱，就像一场萧条或膨胀会扰乱经济体系。但只是在大革命的时候，一个社会的所有轮轴都会发生紊乱。因此只有在一场大革命中社会才会完全分裂，同时将其所有内部力量同时暴露在大家的视线之下。因此只有在全局性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才能达到对局部革命的充分认识。因为只有前者才能给我们构成一个组织化社会的复杂的各种力量的完整图像。

我们将这个观点放在这里，以暴露其本质上的谬误。在他写这些东西之后，两百年过去了，又一个 50 年过去了，而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上不会再发生另一个法国革命了。实际上并非近期革命之间的相似性，而是其区别，才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次又一次地，革命事件使得其当代的观察者们缺乏适当的理论来解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这并不奇怪，因为佩蒂所推荐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从有限的个案中寻找关于复杂事件的类似处。对人类生活领域的其他复杂事务的理解，都是基于对单个较为简单事件的详细分析后得出的，而不是其他什么方法。伟大的革命对我们关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观念提出巨大的挑战，而这些挑战确实社会组织和社会变革的日常内容。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事件中，没有一件不能被大革命之外的环境复制的。因此，我们必须将革命视为一个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的现象。

因此，对革命的分析性对待并未能吸引两个分开但却相关的专门领域——起义和镇压起义——之外的巨大的研究兴趣。很显然，想发动革命的人都希望能有一本教科书来指导他们。同样显然的是，那些受命阻止革命的人也希望能得到关于他们要阻止什么、如何阻止的指导。对二者来说，革命的目的都是改变政治权力，并因此推动新政府实施其关于未来社会的蓝图。所以，结果本身（而非目的、起因）才是阐释革命的关键。

认为革命者和反对起义的作家们倾向于过多地强调权力意志的作用是一个正确的批评。很显然，如果革命确实是巨大的、非人格化的力量，那么就没有必要找出制造革命和阻止革命的原因了。革命者和镇压起义的专家们都最好能够去聆听一下卡纽特（Canute）在南安普敦海岸对其追随者们的很实用的教诲——即使国王也无法命令波浪。另一方面，同样存在诸多寻找适当的革命理论的理由。对 1987 年的将要袭击英格兰南海岸的飓风的预报并不能阻止飓风造成对财产和上百万棵树木的巨大破坏，但是却能挽救部分损失，并让很多人及时做好防备措施。这些日常的、准备充分的转移和躲避在 1988 年两次加勒比大飓风时，有效地防止了人员伤亡。

因此，在此我们可以从区分三个阶段——古德斯彼得（Goodspeed, 1962）命之为“准备”、“行动”和“巩固”的三个阶段——开始分析。准备，指的是以前革命进程的那个阶段，重要的社会集团或大众不再支持那个他们本应支持的政府（或政权），并认可权力可以通过武力转手。行动指事件本身，既有政府因为运用武力或威胁运用武力而倒台，一个新的政权

随之建立。巩固则指权力转移之后，新政府开始保护自身的地位，发动旨在改变社会秩序的变革计划的那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不论在革命之初曾酝酿过多少计划，在分析上都具有相关性。它们既适用于法国革命也适用于海地的军事政变。二者的差别不在于各个阶段的顺序，而在于夺取了权力的政府执行的改革计划的实质。这些革命性计划是社会力量和权力意志二者的产物，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它们是如此难以预期。

革命的社会前提

革命的社会前提是这样一个环境：它将（或允许将）领导者、追随者、发起原因和运用暴力所需的物质设备聚集在一起。这些因素对所有的革命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且虽然对革命的分析都是将其放在一个纯粹的历史背景中，而使得历史环境丧失了分析价值。但正如图兰（Touraine, 1977, 1981）所言，每个社会运动发生的历史环境确实决定了运动的进程和功效。其他作者则以不同方式将这些因素和促进革命的环境结合起来。比如说，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 1962）列举出六个因素：社会发生抗议和骚乱的结构便利；导致明确要求变革的结构紧张；将对这些紧张感的普遍反应路线化的普遍信念；促成爆发行动的因素（导火索）；存在指导和支持运动的协调性行动（如组织）；社会控制机制缺乏足够能力去阻止运动取得成功的结果。虽然有了这些分类，但在区分这些前提时，我们将会发现，按导致人们揭竿而起的社会制度和个人因

素分别讨论将更有助益。

社会条件

在革命中运用武力的可能性按说应该随社会的病症不同而不同，但此处的证据却令人困惑（Calvert, 1984, pp. 64 – 78）。那些报道说杀人率很高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却是稳固的民主制（或准民主制）国家，旨在推翻政府的暴力运动多年来一直未能成功。尼加拉瓜最近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但其持续的暴力却是受国外支持的反革命武装发起的。从欧洲的标准来看，美国的杀人率很高，但其社会却是稳定且保守的。而 19 世纪时，美国的杀人率很低，但却爆发了内战。骚乱，或者国内集团暴力的泛滥，可能会和政治和社会变革相伴随，但它们往往是事件发生之后，或变革的推动力受阻后，才发生的，而不是变革的前奏或变革本身的一部分。

对既有政府或社会秩序缺乏信心或支持似乎也是变革的社会条件。然而，这也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简单。正如甘姆逊（Gamson, 1975）所言，多少人支持变革这一问题并无多大意义，除非我们还知道有多少人、何种人支持既有的政府。政府与其反对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而非双方人员数量，决定了武装冲突的结果。而在革命事件这种动态情景下，力量对比是很容易被很快改变的。

发展阶级分析理论的原意在于希望它能提供关于未来的社会革命结果的确定的信息。对阶级的本质和涵义的讨论至今还

革命与反革命

是社会学的主要成就，但是阶级的现代观点早已超越了马克思和其门徒的简单的实证主义模型了。阶级同样也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而更重要的可能是，其概念的本质就意味着它并不能如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适用于每个社会；基于经验的阶级概念确实是建立起来了，但它们最终被证明是只适用于设计出它们的那些社会。（Calvert, 1982）然而，所有有说服力的作者们都借助阶级力量来分析革命，而且，这种情况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一点：最近被许多学者强调的“现代革命中农民的中心地位”（Skocpol, 1982, 比较 Migdal, 1974），从 90 年代的眼光看来却显得很不恰当。而最近 20 多年来的一个神秘事物则是：精确地说，在农民的重要性由于耕种方式的改变和日益脱离土地而急剧下降的时候，为什么农民运动能在革命知识分子之间却备受关注？即使在农民人数很多且政府害怕其暴动的年代，农民在政治中也很少扮演重要角色。他们需要，而且也一直是，固定在土地上劳作，他们只有在保卫其故土的时候才会应征入伍。要么是在除了死亡和起义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他们才会揭竿而起，发起大规模暴动。矛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本质上最为保守的社会群体走向了极端的激进主义，而这种激进主义是基于绝望而非承诺的激进主义。正如人类学家艾里克·沃尔夫（Eric Wolf, 1970, p. 301）所言：

并没有证据证明如果没有“外部煽动者”的话，

农民将静止不动。相反，农民们因为要矫治错误而起义；但激起他们起义的不公正只是更大的社会失序的局部体现，因此，暴动事件很容易成为革命，群众运动会改变整个社会秩序。战场扩展到整个社会本身，而当战争结束之时，社会连同农民也被改变了。

沃尔夫认为革命既是悲剧性的，同时也带来希望。在他讨论的六个国家——墨西哥、俄罗斯、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中，农民是通往美好时代的先锋，而这美好时代的希望却被“拥有优越技术和组织的人们的神圣联盟（美国）在一场权力的雪崩中埋葬”。但他的这种热情，正如彻·格瓦拉（Che Guevara, 1967, p. 2）的预言：“在不发达的美洲，乡村是武装斗争的主要地区”一样，都是不成熟的。农民还没有成为过，而且直到今天也没有成为，因为被迫起义而成为革命力量。农民是墨西哥革命的步兵而非领导者，而自 1940 年以来，其他人则是假农民之名行事。沃尔夫提到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除了美国之外，各国自己的政府也掌握着农民的命运。而那些城镇居民所把持的政府，则按其意志征服农村的热情，则通过其持续的国内殖民政策而起着很大作用，给未来的农民暴动留下很小的空间，更不用说农民能否控制国家的政治命运了。

和其他城市知识分子一样，马克思错误地认为农民是简单的、愚蠢的〔“农业生活的白痴”，（Max and Engels, 1962, I, p. 38）〕。由于农民本身不足以成为适当的革命力量，领导革命的机会留给了新兴的城市劳动阶级。然而城市劳动者形成未

革命与反革命

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这一信念，更多的是基于逻辑辩证法而非对其军事能力的实际评价。实际上，伴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和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难，而非越来越容易。和其前面的农民一样，工人们的主要目标在于改善其工作条件。但与农民不一样的是，农民可以通过挑战封建主而直接威胁当地政府的结构和农村地区的行政部门，但工人却远离权力中心，且除非他们离开工作场所，否则无法接近权力中心。而且，政府很快就意识到，工人在工厂或矿场的地域集中性也使得他们容易被包围、并因缺乏补给而投降，因而在随时准备动用武力的政府面前显得易受攻击。玻利维亚的巴林托将军（General Barrientos）政府 1965 年对付锡矿工人时对这一战略的运用，被里格斯·狄百瑞（Regis Debray, 1965）认为是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机会的决定性因素。然而不幸的是他对格瓦拉的狂热使得他否决了自己的建议，而跑到玻利维亚去寻找格瓦拉，结果他被捕入狱。

而后工业社会中工人所处的位置使得他们在未来革命中不大可能成为主要力量。由于机器人的使用，作为机器看守者的他们在未来将不能扮演多少角色。而作为技术专家的工人——托洛斯基第一次提出他们对革命的重要性——中，有很小一部分人将从中分离出去。由于政府有预谋地使工人们拥有潜在控制力的工业分散化，从而使得他们在公用事业方面的能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政府对公用事业的依赖，则早就因为战争而将发达工业社会组织化而变得很小，远远小于人们所普遍认为的（Laurie, 1970）。

第三个集团，也就是自视为革命的特殊介质的学生。学生作为统治精英的后备军，在任何国家都有很好的机会去参与政治。*

促使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很多，但因策划而爆发的革命却并不常见，除非大多数人都无视参与夺取权力，并随之急剧地改变社会这一英雄主义的行为。在社会运动的阿布雷（Aberle）分类法中（Giddens, 1989, p. 625），只有转型性的社会运动——即那些寻求社会的激进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才可能在自己的议程中包含革命。证据显示，这种运动很少能取得其宏伟的目标；同时，社会革命更多的是起源于由改革者同盟形成的改革性社会运动，这些运动逐渐地开始面临革命的复杂情况。这些联盟开始融入其他两种阿布雷的类别——改革性运动，寻求既有秩序的特定的、具体的改变（比如宪政改革运动），和补偿性运动，寻求挽救他人于腐败中。将这种联盟转变成有效的政治运动，要求有一个立足于良好的制度本性的社会和国家中的制度架构。

制度因素

革命并非只是一个社会过程，同时还是一个（或一系列）涉及夺取、巩固和运用权力的政治事件。因此，阐释革命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理解国家的本质，以及社会是如何按政治目标

* 本处有删节。——编者

革命与反革命

组织起来的。革命不仅是国家的变革，也是社会的变革这一事实，自从被弗兰兹·伯克劳（Franz Borkenau, 1937）阐明之后，长期被人所忽略。皮埃尔·本邦（Pierre Birnbaum, 1988）做出了其著名的“强国家”和“弱国家”的区分：强国家能经受住挑战，而弱国家则似乎是许多（虽然不是全部）重大革命的先兆。以巴西为例，军队于1964年攫取了权力，并统治了二十多年，加强了国家能力。但是国家却还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对社会行为施加了制度性限制的、相互交织的结构构成。因此，制度对理解革命是很重要的。

从任何角度看来最重要的机构是政府本身，它置身于政治过程的中心，是各种政治要求所诉诸的对象。它的日常生存依赖于其将这些输入转化为令人满意的输出，利用既有的资源和支持去产生新的资源和支持的能力。在任何国家，政府的中心作用确保对其进行认真研究的重要性。因此要理解革命，我们也就需要将政府放在中心位置加以分析。然而实际上由于下述三个原因，即使在允许反对派存在的政治下，革命行动的制度性限制因素经常也未能得到很好的研究。

首先，政府是复杂的。虽然其成员的社会来源不一，而且还依赖特定社会集团取得支持，但是政府本身有其自身的动力。这有其积极的一面：在一个理性化了的现代国家，一人之治不再有现实可行性。同样这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实际上是如艾利森（Allison, 1971）所说的那样，决策中传统的“理性行为者”模型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政府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即使政府行为可以被视为是理性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论的

说法)，这也是在很特殊的意义上说的。作为个体理性产物的集体理性更多地是假想的而非能证实的。现代决策理论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传统理性行动者模型之外的选择，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官僚）政治模型。然而这两个模型中，不同势力和不同部门、不同个人之间的复杂互动，都不能保证我们能够确定地预测任何一个决策的结果。

而这一点却由于政府具有制度性团结而经常被掩盖。组成政府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共同性超出了其与政府外部的人之间的共同性，即使他们属于同一阶级或是一起长大的。在极端意义上这甚至会产生杰尼斯（Janis, 1972）所说的“团体性思维”这种心理失常：一个群体因为维护群体团结感而坚持一个很差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决定，而拒绝接受合理的反对。这种洞察力不仅仅适用于以前的状况，也适应于现在的。因此，从专制君主时期得来的革命的传统认识并不是不能适用于现今，只是需要一些修改。

政府是层级制的。他们位于复杂的行政体系的顶端，依靠其成员、其直线管理及其和地方的联系来确保有效执行其决策。但是公共政策专家们从最近一些失败的或未能在实施阶段有效实施的大型决策中得出了新的经验。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是的，部长”现象，一个职员可以按照其自身的原因而阻挠政府的决定。因此，举例来说，当政府打算对革命集团做出让步的时候，他们往往发现最好的情况是命令没有能得到执行，最坏的情况则是自己被自己的军队推翻。为了推测政府的可能反应，调查者应该提出一些政府也未必能回答的尖锐的问题：

革命与反革命

命令是否被执行了？采用了哪些措施以确保政策得到执行？假如其权威受到了挑战，他们能否通过运用武力恢复权威？

合乎逻辑的，我们会猜测那些运用武力改变政府或社会的人应该是那些受过军事训练并因此而熟悉此道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个群体极为突出，这就是军队。实际上，军队拥有如此巨大的优势，以至于芬纳（Finer, 1976）认为，需要解释的不是为何一些国家往往被军政府所控制，而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没有被军政府所控制。统计数据显示，长期以来，对政治的武力干涉多数来自军队。但是通过军事政变而执政的政府却往往寿命很短，且玩玩最终屈服于另一个武装干涉。因此芬纳区分了干政的机会（*opportunity to intervene*）和干政的部署（*disposition to intervene*）两个概念：许多军队拥有前者，但只有少数军队能拥有后者。

这在两方面都成立。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卡瑟林·科利（Katherine Chorley, 1943）这位中立而公正的观察者，第一个赋予了军队在革命中的地位，并为二战后研究政治中军队作用的学者（主要见诸 Andriole and Hopper, 1984; O'Kane, 1987）铺平了道路。她对以前那些研究革命的人提出批评，认为他们未能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实际的革命领导者们，或许俄国革命的领导者除外，看起来很少从理论和以前的经验里学点什么来对付其面临的困难。除了间或会看看社会主义思想家或敏锐的政治家——多半也是右派政治家，其任务主要

就是反对正在进行的革命——之外，很少会花功夫去对造反的军队和其打算推翻的现存政府的防卫力量的特征和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的历史分析。

(Corley, 1943, p. 11)

因此，是科利第一个阐明这条原则的，除了一些保留，这一原则经住了时间的考验，给那些抱怨发动革命有多难——“现存政府完全控制了武装部队，并能随时运用武力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使得任何反叛的力量都没有希望战胜他们”——的人们一个根本性的警告。因此，革命可能在一场失败的战争后期爆发。对政府的最大威胁还来自军队和作为其威慑对象的普通民众之间的友善关系。这种友善关系在巴黎公社时期的法国十分显著，而在临时政府时期则在历史学家撒尔斯（Thiers）的领导下改变了这种情况：将士兵们撤回兵营并隔离开，对其进行思想整顿之后再投入战场。^{*}在现代，将军队与平民群体隔离开的传统做法因防暴警服和装备的使用而重新得到加强：一方面使得他们疏离了平民，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在执行国内安全任务时自身能得到适当的保护。

因此，士兵们在革命中的特殊重要性并不取决于其社会构成，而取决于制度性力量。军事制度能给士兵们打上制度性忠诚的烙印，而对军官的录用、选拔和培训也使得他们独立于社会的阶级结构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等级。他们因此能并确实做到

^{*} 此处有删节。——编者

革命与反革命

了独立于他们作为个体而认同的社会群体而行事。

左派和右派都有这样一个传统假定：武装部队必然是统治阶级的爪牙。即使我们抛开统治阶级在统治时到底做什么这个令人着迷但日益乏味的问题不论（Therborn, 1980），我们发现对军队自身的研究并未显示可以支持这一假定的足够证据。事实上，军官团与平民间关系的实质是如此多样，以至于多次出现平民将军队纳入其政治机器中的情况，以至于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巴西——这一过程是如此的被彻底制度化，以至于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能像拥有自己的财政支持和政党工作者一样，拥有自己的军事支持——它们都是巴西政治的制度性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传统的军队干政和军政府的观念都需要矫正。

军队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不止于攫取权力或运用社会控制来巩固权力、维护革命政府。正如阿德尔曼（Adelman, 1985）所说，伟大的社会革命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们在发动高成本战争这方面提高了国家能力。同样的现象最近在伊朗得到了验证，伊朗运用了大众动员和“人潮”策略来反击伊拉克入侵者，使其陷入僵局并最终取得胜利。尼加拉瓜的革命者同样能够顶住在1979年以前被认为是不可抵抗的压力。如斯考克波尔（Skocpol, 1988）所言，很有必要对这一论题进行限定。地缘政治的因素使得墨西哥革命在对外战争中动员民众的能力并未得到考验（虽然革命本身是历史上代价最高的内战），而作为结果，1943年（革命）后的政府能比其他情况下的政府更好地实现其社会目标。

对警察而言，与社会潮流隔离并不可能，因为他们的任务就在于生活在民众之中并因此而面对各种社会压力。确实存在隔离——他们的妻子会经常地告诉你，然而这是在社会中的隔离，而非军队生活那样的物理上的隔离。因此，警察形成了对他们负有维持其既定秩序责任的社会的他们自有的制度性忠诚。这和犯罪分子之间有一个很有趣的类似：二者都对社会的自然秩序持有相同的基本假设。在 1969 年动乱爆发之后的北爱尔兰，被一些人称为“良好的、诚实的罪行”（这一称谓并不是什么反话）有所上升，但对于一个外来的观察者而言，令人惊讶的是社会的极为保守的性质及其假设。实际上，正是社会的这种极端保守主义使其能持续这么长时期的暴力。

警察队伍越是武装化，他们的行动也就越军事化，并因而成为一个有效的镇压工具。把他们置身兵营，武装起来，戴上头盔，拿起棍棒，装入车子，这样就能将他们有效的隔离开来，同时使他们成为更有效的武力使用者。但是，他们还是经常被军队视为是二等公民，而应该服从他们。因而当事情闹大而超出控制时，政府一般不敢指望警察。而革命后成立的政府因此往往建立强有力的集权的安全部门，来镇压反革命以保护自己，并作为加强改革力量的工具——这或许也是其主要的功绩吧（如果这个词可以适用的话）。虽然革命前后的组织上存在人事上很大的延续性，组织本身却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重新改组，而且它们的权力延伸的如此之大，以至于只有社会标准的巨大变革才使得其成为可能。

此处并不打算逐一讨论与革命有关的主要机构性群体在革

革命与反革命

命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足以说明革命并不仅仅是一个动员潜在的利益集团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制度性结构——动员赖以发生的结构。

个人因素

个人的行为，尤其是领导者发挥的作用，在革命的发起和发展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很奇怪的是对革命中个人动机的研究还是十分有限。

个人因素又可进一步分为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许多研究革命的文献还是延续传统的假设：激励一个人革命的东西往往也是激励所有人革命的东西。一个例子就是佩蒂（Pettee, 1938）所说的革命前体验到的“抽筋”。但即使是革命的领导者，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他们的经历的话，会发现他们的背景和成就也和普通大众差不了多少；他们与众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属于不同的群体、他们经常会发现自己置身一些重大转折的环境中。

阐释结果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正式夺取权力是革命的关键阶段。真正发生的是一个统治阶级被另一个统治阶级通过武力行动赶下台，从而打开了通往新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道路（Calvert, 1970b; Brier and Calvert, 1975; and Brier, 1982）。

对旧政权的守卫者来说，将会接受什么处置是很清楚的。他们将会被剥夺掉正式职务、头衔和特权，从权力网中隔离出去，关入监狱，流放乃至处死。他们能否在革命后继续扮演角色不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他人。下台的政客们发现自己要想回到政坛要比失败的拳击手回到拳坛相对容易的多。

那些取得权力的人又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却难以回答。即使在一个动荡社会中，通过武力占据官职被认为是可以合法取得运用该职务权力的程序，但实际运用这权力却是不同的一件事。一个错误地相信职务带来权力的现代革命者是阿博尔哈桑·巴尼-萨达尔（Abolhassan Bani - Sadr），他努力奋斗，实现了自己很早就拥有的成为伊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雄心，结果发现他所帮助创建的共和国只是允许总统去“主持”。

或许“枪杆子里出政权”很有警句意义，但却是根本上错误的。正如一个富人试图用一个使用炸药作燃料的新型内燃机做他的豪华游艇的动力时会发现的一样：武力并非权力。武力可以是暂时的或间断的；而权力则持久地行使意志，并能确保命令能够得到遵从、决议能够得到实施。对权力的分析最后会回到武力，正如货币最终需要回到金子或等价证券，但是其日常运作却依赖其可信性一样。一个经常诉诸武力的政府并不能提高其可信性，而单独将政府孤立出来看却会再次抓不到要点。一个政府只有在和其反对力量相对比的时候才能看出强弱，一个足够强的反对派只要自己想，就能最终会成为新的政府。而问题只不过是为何在这种场合下，有的人努力去攫取权力而有的人却无动于衷。这明显取决于他们想运用权力去做什

么。

一个新成立的政府都需要巩固自身的权力，这一巩固阶段可以进一步被分为两个阶段，虽然这两个阶段也经常是相互交迭的，且二者的划分并不非得按时间顺序。第一个阶段是巩固政府自身，采取各种紧急措施防止各种反扑的可能性。这经常是一个短期过程，因为政府一般都能且经常都这么做——扩大其应付突发事件的权力，以加强其相对权力，即使是在自身很难会被成功挑战的情况下。第二个阶段则可能一开始就实行，但往往在耽搁数周或数月之后才从根本上展开。这个阶段就是实行新的计划来广泛地改造这个社会，这个计划符合新政府的理想并附带地能增加其生存的机会。

这些变革被视为是“改革”。虽然改革一词的独特含义最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以至于经常用来指和“变化”类似的含义。但是我们此处的用法还是很精确的，包含社会进步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和“进化”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如果他们之间存在差异的话，那么就是改革实现的进化性变革是很难颠覆的。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在程序上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当一个发生的时候，随后可能发生另一个。

那么，难道革命都注定以热月党人的篡权而告终，而永远失去其胜果？革命之后必定会伴随着反动？答案既不能满足革命者也不能满足反革命者：反动并不必然伴随革命而来，或者至少是，在一个参与革命者的有生之年内不一定会发生。只有在继位政府卷入昂贵且破坏性的战争中，并因此而侵蚀其合法

性的时候，往往会发生。但是现代国家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监视和镇压机构，正如拿破仑的警察部长，约瑟夫·富歇，使得这种颠覆活动只能是梦想。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很少需要借助于监视和镇压，因为与那些非政府的群体比起来，政府的权力，尤其是武装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因此为何革命之后往往不再如以前那样伴随那么多反动的因素，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则不复存在，此时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则是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革命是否还会发生。

第三章 理论之形成

对革命的思考

形成理论比观察和阐释重要得多。阐释仅为某一现象提供了一幅易于理解的画面，但并不一定要求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全面综合的解释。理论的目的正是要提供这种解释，并且在一定背景下进行解释，使我们得以预测将来事件可能的结果。

早期对革命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局限在革命的目的之上。法国大革命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对革命的解释实际上是自成一格的，并成为了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历史推理传统的一部分。直到 19 世纪中期，才出现比较历史的方法，其原则列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逻辑体系》一书中。如果说这种方法在横向上仅受

到例子多少和时间长短的限制，则在纵向上受到的限制更为严重，因为从通常历史资源中所获得的信息量是极为有限的。尽管如此，比较历史的方法至今在对革命的理论阐释中影响力仍是最大的，并且如前所述，仍是理解革命的基本工具。

马克思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正是用的传统的比较历史的方法。然而，他对后人的重大影响还不在于他的方法论上（参见 Poper, 1962, II），而在于他在很大程度上让其同代人和追随者认识到，他对事实的理解胜过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在理论的形成上，马克思和所有理论家一样，对其掌握的事例采用了类推演绎的逻辑，这主要来自经济学领域。如果世界贸易中的危机带来了革命动乱，好，那么下次再发生这种危机的话，会爆发更多这种革命动乱。如果富人将财富都聚敛于自己手上，那么他们之所以能这样一定是因为他们设法控制了政治秩序。这一切的根本假设是，政治事件和经济现象存在不可避免的联系，它由历史上的例子所支持，但并不通过这些例子得以检验。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命题存在着人们无法驳倒的模糊性。难怪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者这样写到：

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地关注不太概括的、更多的基于历史的类型学，而非近期的社会—科学理论。因此他们提供了关于社会的革命性变迁（胜于普遍意义上的政治暴力）的更精致、更完整的解释。因此，马

革命与反革命

克思主义理论成为被历史学家用来阐明各色革命的最内洽的、有成效的理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Skocpol, 1979, p. 34)

与近年的社会科学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针对的是不那么一般化而更有历史依据的范畴，并且为社会革命转变提供了比它们（比如说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暴力）更出色完整的一套解释。因此，历史学家在阐释各种具体革命时，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他们所使用的最有效的社会科学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联系是不完整的，因为人们没有用历史实例来检验和修正这一理论所提供的解释。

事实上，斯考克波尔（Skocpol）的评价不管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都是不公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色之处正在于它是无法证伪的。马克思从未对他理论中的主要的变量“阶级”进行过满意的界定。他并未真正理性地解释过为何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或者为何资产阶级的种种行为能使他们获取政权。他也没有提到过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序列。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能对预测革命提供形成充分的基础。而且，我们都很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去世后的现代社会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所以，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种种修正。他们有的增加了革命发生前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有的对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中的中心地位进行了重新评价，还有的接受了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独立性，以解释政府对

革命镇压的有效性。然而，让·伊尔斯特（Jon Elster）对这些办法都不满意，他所主张的几乎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彻头彻尾的重建。他这样写到：

我们因此可以断定，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假设工人、资本家或者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由于他并未对这一假设做出任何论证，这一理论是站不住脚的。问题并不在于事情不能合情合理地按照其中一种预想发展。非理性行为也可以成为一种极为强大的政治力量。相反真正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没有为他的想法提供理性依据，以证明事情会像他希望的那样发展。他的思路实质上是建立在臆想而非社会分析的基础上。

（引自 Taylor, 1988 p. 225）

19世纪后期，有关革命的著作相对较少。1871年后，大欧洲的霸权地位得到巩固，欧洲保持和平，即使在又一个新世纪开始之后，伊朗、墨西哥和中国革命也仅被看作是对欧洲制度成功的证明。因此，我们不难理解，直到20世纪20年代，对革命比较历史的兴趣才真正明显复苏。人们为了预测俄国革命将来的道路而在历史中反复寻找证据。无庸质疑俄国革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一个全新的现象，还是到一定时候就会走上先前革命的道路。

1938年，致力于研究法国革命时期的美国历史学家普林

革命与反革命

顿撰写了革命的剖析一书。该书对英、美、法、俄革命进行了比较历史的研究。在书中，他对所研究的四个时期进行了类比，并由此指出俄国革命事实上与早期社会革命有很多相似之处，并可能最终进入他所称的“热月”时期。在这一时期，革命狂热逐步减弱，一个新生和更有效的政权在经历了一段腐败时期的检验后得以巩固。然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普林顿并不轻易归纳出任何普遍性结论，却着重于描述案例间的许多不同点；实际上他专门提醒过其他学者，不要将他的模型视为权威（Brinton, 1952, p. 3），不过许多学者忽略了这一告诫。

自二战以来，新国家诞生的同时伴随着新的社会革命。由于可供研究的革命案例不断增加，不少学者都试图在同样的传统背景下研究它们，并基本上采取同一标准。因此雷顿和斯密特（Leiden and Schmitt, 1968）基本上是在重复普林顿的作品，选择了墨西哥、土耳其、埃及和古巴四个例子。这些例子都是之前没有进行过比较性研究或近期才出现的。然而，在理论介绍部分，他们认识到，社会科学家试图做的是从这些案例研究中得出更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并能有效地推广到其他例子中。

在比较历史的传统中，这一点更清楚地体现在 1972 年首次出版的约翰·邓恩（John Dunn）的《现代革命》一书中。该书对八个例子进行了研究（包括俄罗斯、墨西哥、中国、南斯拉夫、越南、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和古巴）。虽然建立在二手资料和较高的一般性的基础上，这本书仍然信息量很大，其引言和结论都对革命的传统认识提出了有趣而富有启示性的挑战。不幸的是，邓恩受到了太多英国哲学悲观主义的影响，对

创建真正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深感忧虑，所以他并没进一步将革命的理论推广。他认识到革命是由一小部分精英为了巩固政权，使其计划得以推行。他也承认并描述了获取政权的不同方式。但他并没有将政权的获取方式和革命结果的性质联系起来，除非在两者都被认定是权威的情况下。对于邓恩来说，革命仍然“在本质上是一种引喻”。但根据我们前面所说过的，社会现象只有与其社会意义联系起来时才能真正被理解，而如果革命仅是一种引喻，这是说不通的，我们也不会如此热烈地庆祝法国革命 200 周年。如果真要说它是一种引喻，它也是特别强大有力、势不可挡的，因为在它的名义下，军队出动作战，士兵英勇献身。同时它不仅对法国人民，也对全世界人民具有重要意义。在该书的第二版引言中，邓恩认识到了这一长期以来的意见。他把试图建设社会科学理论的努力称为一种“绝望的凄凉”（Dunn, 1989, p. 25）。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我们早已说过，不必对这一评价太当真。

这一时期，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比其他任何书都更能加强社会学关于革命是一种稀有现象这一观点的认识。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该书与革命理论并没有什么真正关系。实际上，其副标题“现代世界诞生时的贵族与农民”就已清楚指出，这本书作为历史社会学中的一本经典著作，关注的是前现代社会如何演化，并与前人相区别，它充分认识到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在俄国和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其他同类著作一样（如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这本书立即被称赞为“杰出”和“重要”的，并在一夜之间获得了伟大

革命与反革命

著作的声誉。一个原因是摩尔作为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对经典著作进行了研究，不仅取得了社会学学位，还于二战期间任职于战略研究所。他的这本书写的正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现代化过程，而这正与美国的当务之急紧密相关。另一个原因是被人们委婉称道的，摩尔对于现存历史学派和学术传统的“独立性”。他揭穿了一些人们难以相信的事实。英国人喜欢把自己想得爱好和平，但事实上英国并非那么独特。美国人习惯将美国视作一个与其他社会根本不同的社会——一个民主的、在自由中诞生并建立在人民意愿之上的国家——但这只是一种妄想罢了。摩尔坚持认为，暴力和压迫，无论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形成，还是在共产主义国家的诞生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中，都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他指出，不同点只能通过其革命历程的不同性质才能区分出来。这一主题，无论正确与否，紧紧抓住了同代人的注意力，并使摩尔成为人们在讨论现代革命理论时的重要人物。

摩尔运用的方法实际上仍是比较历史的方法。他集中于几个例子，其中前三个例子——英国（他称做英格兰——一个常犯的错误，但并不构成多大罪过）、法国和美国，是传统类型的。接下来他通过对比的方法研究了日本、中国和印度。他坦率地承认，研究这三个例子并非因为自己对这三个国家有专长知识，而是因为它们的确十分重要。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却产生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作品所依赖的基础。他曾提醒我们说：“比较分析绝不能替代对具体案例的细致调查，这一点是再明确不过的。”（More, 1969, p. 11）但相当奇怪的

是，他当时在哈佛俄罗斯研究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却并没在书中对苏联进行研究，而这却关系着他所要做出的结论。

摩尔从他所研究的案例中辨别出了“三条从前工业化时代通向现代社会的主要历史道路”（More, 1969, p. 12）。这几条道路可以被我们称做“理想类型”。它们不仅在很大意义上将俄国和中国的经历联系起来，也将它们与当时的论题连接起来，即经济现代化和革命的关系。

摩尔把第一条道路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当然，他知道“红色旗帜”这样的用语对非马克思主义者所带来的效果）。这些革命是指英、法、美等国所爆发的大革命和国内战争，它们使这些社会得以将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结合起来。摩尔在其著作中如此频繁地使用“资产阶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他在有效使用这一术语的同时并没有定义它；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时（More, 1969, p. 15）是专门用来定义“城市居民”的，但在后来再次出现，以及反复出现时，已经不可能是这个意思了。第二条路线是资本主义的反动形式。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和仍居统治地位的土地阶级中的异端分子联合起来，领导了工业化的进程，并在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下达到顶峰。这些国家中资产阶级的革命动力十分弱小，如果他们采取彻底革命的形式实现愿望，革命势必会夭折。第三条道路“当然是”共产主义的道路。在俄国和中国的农业官僚主义挫败了现代化动力后，大批农民被现代化的力量所动员起来，从而为打破旧秩序的革命奠定了基础。每条道路所共有的因素是资产阶级被动员的程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无产阶级被动员的程度。最后，

革命与反革命

印度作为一个显著的特例被单独列出，因为它并不属于任何一条道路。

在英国，农民对于现代社会的诞生并不重要。原因很简单：他们在英国已经消失。他们之所以消失，是因为贵族利用手中的国家权力加快了对公有土地的圈占。由于大地主占有了土地，当地政府也被置于其控制之下，只不过这种大地主并不像法国在城市，也不像德国居于农村，而是两者的混合——那些发展现代农业从而富裕起来的农村资本家。城市资产阶级崛起的同时，地主阶级并未衰落；相反的，他们通过相互间恰如其分的让步而结合成新的成分，从而完成了向一个更广泛权力基础的过渡。

与之相对比的是，在法国，以革命毁灭旧秩序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如果大革命没有瓦解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日益形成的联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其结果将与德国和日本类似。大革命使激进派从资产阶级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并得到巴黎市民大众的支持，而这一过程又中途停滞下来——因为农民以武力强制农村撤消领主主权制度后，结束了其激进行动，但同时断绝了对首都的食物供应。向民主转变的道路虽然最终开辟了，但却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至于美国，摩尔用几句话对美国革命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它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都很成问题。他这样断言到：“认为美国经历了一场反殖民的革命也许构成了对外宣传的好材料，但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实在是很蹩脚的。”（More, 1969, pp. 112 - 13）当然，完成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不

可能不需要暴力——美国内战在“整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重建时代“切下了血腥的裂痕”——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对美国来说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它改变了美国社会，但它并非必然发生的，因为奴隶制和资本主义方式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虽然联邦政府停止继续实行奴隶制对巩固民主政权是至关重要的。

农民阶级的激进主义在摩尔看来是造成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原因。他将这种激进主义归因于在没有现代化的背景下，农民阶级对现代生产方式的压力无法适应，并且随着国家力量的增加，农民与当地地主的关系疏远了。农民不可能仅通过自己的力量成功发动革命；他们必须受到来自其他阶级的领导，而且即便是这样，大多数农民起义还是失败了。俄国农民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这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所无法实现或满足的，即：“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当然还要停止战争。”（More, 1969, p. 481）当时只有与现存秩序没有联系的布尔什维克才有能力实现这些目标，夺得政权。而当农民意识到自己被愚弄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政府与社会的分离。那些能在保守主义框架下使社会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领导纷纷上台。“反动分子总是让这样一个似乎很有道理的观点大行其道，即推行现代化的领导正在不断改变和让步，而这只能唤起下层阶级的欲望和导致革命。”（More, 1969, p. 441）但在德国和日本，保守领导阶层虽然认识到，是下层阶级承受了现代化的代价，但还是通过建立一系列官僚组织和强制性机构，使统治者可以不再考虑可

革命与反革命

能遭到的反对。（并不是英国人不想这么做；不同的是在那里国家太弱小，镇压的力量也远远不够）法西斯主义是一场动员中层阶级中的贫穷者和农村力量去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它标榜一种理想形式的乡村生活，并恰到好处地不具有任何经济上的意义，并以等级和对权威服从等概念加强他们镇压机构的力量。

摩尔的结论是悲观的。他深信，不管是西方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特别是俄国共产主义）都早度过其高峰期。他写道：“作为成功的学说，它们已开始转变为意识形态，那种默许和隐藏了无数种镇压形式的意识形态，”（More, 1969, p. 508）自 1969 年来英国和美国发生的很多事都只能证明这一预言令人震惊的准确程度。在没有发生革命的情况下发展，发展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并且渐进主义可能来得过于缓慢。然而，发生革命的代价也同样是沉重的。共产主义无法逃避斯大林主义的责任——为了在智力和军事上胜过敌手不惜采用镇压手段，在易北河两岸，强大的既得利益阻碍了一个真正自由社会的发展，为此它遭到了所有政府的谴责。所以，摩尔最终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他的著作证明了其所处时代一种普遍信条，即革命是经济现代化的基本载体。但甚为关键的是，它缺少对俄国的个案研究。农民对俄国革命发挥了最主要作用这一论题只有从农民是主要牺牲者这一意义上才真正成立。此外，强调法西斯主义是未能发生革命的结果也是很不确定切的。德国实际在某种形式上发生了革命——希特勒上台掌权，并用权力对德国社会事实了深刻的变革。东德仍保持着那

些结构上的变化，在奥地利对库尔特·沃德海姆（Kurt Waldheim）的支持，和巴伐利亚在 1989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共和党的发展都证明了，对法西斯主义的热情仍然很高。德国革命之所以没有被看作一场革命，是再次因为从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时期中继承下来的那条根本甚至一度感人的信念，它使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相信，革命是左派而非右派的事。

在比较历史中关于社会革命的最近著作是瑟达·斯考克波尔（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斯考克波尔希望通过对三次革命（1787—1800 年的法国革命，1917—1921 年的俄国革命和 1911—1949 年的中国革命）的严谨的比较分析，“重唤起我们对革命的特点和问题的感知，因为它们是在历史上发生的，”并且“对分析现代世界史上的社会革命性质的转变提供可供参考的框架”（Skocpol, 1979, p. xi）。

然而，如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其他作者一样，斯考克波尔在开头就以很严格的术语来界定她的研究主题，以致我们完全清楚地知道下文将会是顺理成章的。社会革命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罕见却重大的事件，它们使少数国家（法国、墨西哥、俄国、中国、越南、古巴）改变了国家组织、阶级结构和支配性意识形态。简而言之，它是一种复杂的解释现象，而这种对象只有相当少的历史实例。

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国家和阶级结构迅速而根本的转变，他们伴有或在一定程度上经由自下而上的阶

革命与反革命

级暴动。社会革命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冲突和转变过程，首先在于它是由两种组合构成的：社会结构变化与阶级剧变的重合；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重合。

(Skocpol, 1979, p. 4)

在斯考克波尔看来，现存社会科学对革命的种种解释都是不够充分的（为什么？），她提出社会革命应该从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并将注意力特别集中于那些对革命前国家组织的崩溃和新组织的出现有重要影响的国内外发展。与沃尔夫（Wolf, 1970）和邓恩（Dunn, 1972）相同的是，她也认为自己用比较历史的方法在所研究的例子中寻求一种“可概括性的逻辑”；不同的是，她是试图从深度上研究这些历史案例。但事实上她与之前所有对革命阐释的不同之处是她不赞成任何有意识的目的。在斯考克波尔看来，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即革命仅是结构主义条件下的偶然产物，自主意愿对决定结果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她认为，革命具有目的性的假设会导致这样的观点，即“革命的最终充分条件是共识支持的消失，如果群众已开始有意识的感到不满，则没有一个政权能继续生存下去”。(Skocpol, 1979, p. 16) 任何这种看法，比如将南非政府作为“极端强制性和不具有国内合法性”政权的例子，在斯考克波尔看来都是“十分幼稚”的。因此社会革命仅是各种力量竞争下未经策划的产物。不同群体进入相互冲突中，其结果取决于谁获得最后的胜利。无论个人、群体，还是阶级都不会在革命体现出传统观点所要求的逻辑和一致性。

然而，国家并不只是为了获得合法权威性而发生冲突的竞技场。斯考克波尔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理论上承认国家的强制性，但仍在实践中把国家想象成一个竞技场。在国家自主性上，她坚持一种她所说的最原始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她来说，国家是一种“自主的结构——它有自己的逻辑和自身利益，这并不一定与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或政治组织中某个群体的利益一致或相吻合（Skocpol, 1979, 第 27 页）。”国家并不只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实际上，生产的逻辑意味着国家必须“在某种程度上”（Skocpol, 1979, p. 30）与一个或多个统治阶级争夺资源，甚至在适当的时候以一种令统治阶级反感或威胁统治阶级的方式分配资源。因此，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斯考克波尔花了大量时间分析阶级冲突和反革命的军事力量对新国家组织所带来的挑战。

与早期的比较研究不同，斯考克波尔并不像巴林顿（Brinton, 1952）和邓恩（Dunn, 1972）那样依次验证每一个案例，最后对其发现进行总结。相反，在进行理论介绍之后，她在第一部分对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性的梳理，并以三个案例来支撑。这一梳理又分两部分：旧政权的危机与农业结构和农民起义。后半部分研究是针对结果的，它集中于国家建构的过程，但每个案例又包括很多章节。

马克思主义中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的概念构成了每个案例分析的基础。但她强调这一概念只能通过对政治结构的改变才能起作用。她指出现存革命理论都是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而这一改变却必须被看成结构的而非意志的。第二，革命不能仅

革命与反革命

从国内的层次理解。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发生既需要有利的国内条件，也需要国际条件。但国际条件自身并不构成充分解释，所以这并不意味着她支持沃勒斯坦（1974a, b）的世界体系论。第三，阶级并非惟一的行为体，国家也不只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国家具有潜在的独立性和强制性。实际上，斯考克波尔是从金博格（Ellen Kay Trimberger）那里得到了启示。她所指的大型社会革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在精英领导下以群众的名义而发生的革命。虽然在革命前期，社会革命是从群众行动中产生的，但其后发生的改革却是由精英阶级在国内环境和世界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国际局势中操作的，特别是世界经济的结构，和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可供借鉴的模型。它们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们影响着人民，也因为它们影响着统治者。

然而，总的来说，斯考克波尔的著作虽然比前人更详尽，但却过于植根于比较历史中，以至不能发展出一套令人满意的具有普遍性的革命理论。正如她自己所说，“需要强调的是比较历史的分析并不能替代理论”。（Skocpol, 1979, p. 39）和很多早期作者一样，斯考克波尔排斥了真正理论化的过程，因为她没有认识到她论证的逻辑受到她选择框架的限制。她关注的很多地方其实并不构成什么问题，除非你正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同时，她所忽略或不屑于阐述的一些东西并不只是嚣张的资产阶级的神秘面纱，而是关系到科学思维和社会科学的本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其他社会科学家试图将革命理论融入对其他现象的研究中，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因此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 1998）在他的《理性与

革命》中对斯考克波尔关于革命是非理性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和他的同事仍然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并证明了两点：理性选择的理论可以应用于革命同盟的建立；其结果与很多历史学家的观察是一致的。他自己认为，从理性的狭隘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作为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并被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 1965）所运用的那种理性〕，农民是十分理性的，因为他们只参与有足够理由获得成功的革命，也正因为如此，“至今成功的社会革命仅出现在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型之前或转型的过程中”（Taylor, 1988, p. 81）。他进一步认为，斯考克波尔所假定的其他结构性的和情境性的要素中没有什么是与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故意的解释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正如约翰·罗默（John E. Roemer）有说服力地说明的，在同样的集体中（Taylor, 1988, p. 244），即使人们在革命的形势下将信念付诸行动而非出于纯粹的个人利益，他们抱持着信念的事实就很能表明“为了某种伦理规范或者道德能清楚地实现，它必须是有效的，尽管人们并非因为这个原因而接受它”。于是革命家（“列宁”）就会在实践中发现除非他致力于不停地重新分配财富，否则他不太可能非常成功，而政府（“沙皇”）就会发现如果它想挫败革命的热情的话，它处罚穷人比处罚富人多的话他就要付出代价。我们已经看到了让·伊尔斯特是如何同样的可以用理性选择的理论来解释是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按照马克思在 1848 年所预测的方式行动最后失败。

社会—科学的理论

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其条款比斯考克波尔的评论看起来限定性更强一些。正如顾尔(Gurr, 1970, pp. 17 - 18)所指出的：

理论的主要科学标准就在于它以实证的评价为依据。便于理论评价的四项属性是：可证伪性、定义的明晰性，在分析的不同层次上相关变量的关联性以及用它来分析更广领域里的事件的适用性。前两个是作评价的必要条件，另外的则是可欲的条件。关于革命的绝大多数的旧的理论 and 观念的一个基本的局限就在于很难从中推理出可证伪的假设。即使有，也很少用适用的实证方法加以阐明。极少的情况和比较研究用到它们，这一事实更加明显表明即使是为了分类学和概念的目的，它们的用处也是有限的。

这些都可能是事实，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值得赞扬的是，顾尔自己就努力做到他自己推荐的建议。问题就是要在三个主要的领域之间达到综合，也正是在这三个领域——心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中人们要寻找解释。这并不是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切实际的任务。

心理学的解释

至少从法国大革命以来，人们就探询革命者们为什么要那么做的心理上的解释。早期的解释，不可避免地不尽人意，用不科学的认识将它们当作人类天性的邪恶来对待。此外，甚至在现代心理学已经开始作为一种科学出现以后，集体行动的研究还被“群体心理”的观念所迷惑，法国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 1960）就认为这就是在革命的环境中群众以那种方式行动的原因。尽管还被“群体心理”的假定所影响（他用群体本能来描述这一假定），托特尔（Trotter, 1953），他在一战期间在这个领域里最先取得了主要进展，他就认识到个体本能（或者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动力”）的潜在的重要性。马丁（Everett Dean Martin, 1920）抛弃勒庞的“群体心理”的观念，取而代之他将群众明显的缺德的行为归因于“相互赞同去做被禁止的事”。这其中他追随了爱尔沃德（Charles A. Ellwood, 1905），爱尔沃德早就已经注意到在革命的形势下，一旦人们被剥夺了他们正常的准则就可能以奇特罕见的方式行动。因此在革命的条件下，旧制度瓦解了，变革以正常条件下无从可能的方式既迅速且广泛。

所有的主要的研究革命的心理理论都没能达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准：他们假定在革命的环境中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行动，革命有着心理上的原因。事实上，从 1879 年的法国大革命以来无人指引的群众行为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甚小，尽管

革命与反革命

没人可以否认个体因素在决定个人在革命的形势中所起到的作用上的重要性，除开几个领导人的情况以外，我们确实对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的原因知之甚少。

幸运的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心理学，过去常常被在临床基础上的个体主题的研究所支配，已经设法避开这种的群体解释。尽管弗洛伊德早期对政治领导阶层的研究在今天被更多地研读是因为它清楚地显示了弗洛伊德和他专注的问题而非领袖的本性，是弗洛伊德清除了“群体心理”的观念，而且还将注意力集中到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互动。

现代心理学研究革命的理论主要是利用原本为了其他目的而收集的数据。由于其在甄选武装力量和商业管理的候选人时有明显的效用，关于领袖的文献大量涌现。这个领域里的里程碑就是《权威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dorno et al. 1964）的出版，它导致人们重新考虑在包括革命在内的各种形势下领袖的作用。一个直接的衍生物就是沃尔芬斯坦（Wolfenstein, 1964）的名为《革命人格》（*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的研究，基于列宁、托洛茨基和甘地的职业生涯，而且还有许多个别的领导人的研究。

然而，在对革命作心理的解释上还有另外两个难点。首先，不太可能把临床的方法运用到政治领袖的身上，而且对历史人物的人格进行追溯式的评价，尽管弗洛伊德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但还是得冒着变成纯粹循环论证的风险：领袖们做了这个，那它就肯定会在他的童年偶然发生过。如果要认真考虑的话，它简直就不需要说明这样的思考需要从其他的出处加以确

认，更适宜目前用童年经历（例如一份学校报告、早年关于这个主题的信件、家庭成员以及朋友等等）。其次，领导能力并非抽象地行使的东西，它当然也并不只是个人的函数。现代心理学家一致认为领导能力是四个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实体的函数：个人、群体、形势以及使命。因此，尽管革命的解释可能是从领袖或者领导们的作用开始的，但除非它们将它放到领导地位得以产生的更广的社会背景之下，否则这样的解释不会有多大意义。

顾尔的书就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关键的作品《为什么人们造反》（*Why Man Rebel*, 1970），是一个建立在心理学的假设之上的非常正式的应用，但其范围扩展开来，将目前被接受的学问都综合起来了。它与革命的问题高度相关，但只在更广的政治暴力的背景之下涉及革命。其目的就是要提出一套政治暴力的综合理论。因此它也就是顾尔想要解释的政治暴力而非革命的发生，而且至于革命要求成功地使用暴力，他的结论需要其他有关政治暴力实际运用方式的信息加以补充。

推动暴力的使用的动力是由顾尔在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上建立起来的，这一概念已经由群体心理的临床观念中熟悉起来。这就是“相对剥夺”的观念，这个词被用来表示在集体利益满足上的“应然”和“实然”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张力，这一张力让人倾向于暴力（Gurr, 1970, p. 23）。冲突只被看作是政治暴力的特殊情况，在冲突中另外的想要争得同样价值的群体也认同在预期与结果之间的矛盾的理由。但顾尔想要避免理论家们在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使用暴力上的区别。取而代之他

革命与反革命

区分了会产生相对贫困的三种条件：递减的剥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预期没有变化而与之相关的能力却下降了；热望的剥夺，在这种情况下预期上升了而能力没有发生变化；进步的剥夺，在这种情况下预期上升了而能力下降了。三种情况都与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但三种情况中，第一种递减的剥夺，尤其有些和纳粹的兴起有联系，顾尔相信这种在历史上是最普遍的。第二种，“上升的预期的革命”就是相对新近的现象，它把它的特殊的兴趣归到与马克思主义的假设有密切联系的假设上，这个假设认为财富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会从根本上促成社会革命的到来。然而，第三种形式与过去主要的社会革命最普遍相关；概括自戴维斯（Davies）的“J曲线”假设，这一假设认为，当一个延长的客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时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段短时间的恶化的时候，革命最可能发生。Davies 声称它为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埃及革命所佐证，纳粹兴起上台和1842年路德岛的“杜尔反抗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这些条件中的每一个都只引起了不满，即“未组织起来的集体暴力的潜能”。信仰政治暴力和强制性控制的本性以及在职政权指令的制度性支持，顾尔把它作为“将敌对的动机连接到政治暴力的数量和形式的因果关系中最终的决定因素”（Gurr, 1970, p. 155）。最后，他建立了许多正式的模型来作为将来多元分析的基础；在这些当中，他说明了他的变量如何可能导致骚动、阴谋或者内战。

因此，当人们要求他解释后果的时候，顾尔就离开心理学转向社会学；确实，他的正式的模型，作用于政府及其反对派

的对立的因素在事实上就是精心制作的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忽视必须问到的根本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个人的价值是什么？他们的预期比他们的能力高多少？因此，尽管他的著作非常有意思，但与其说是它给的答案有趣倒不如说是它提出的这些问题有意思。

社会学解释

最盛行的对于革命所作的社会学解释，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功能主义的解释。社会的稳定性有赖于社会秩序持续满足其公民的要求。如果它做不到，那么使政府得以运作的那些对于社会价值的基础性的共识就丧失了，而一旦共识没有了，就开启了群众对于现存秩序的拒绝之路。这样的解释倾向于将实际的权力的转换当作小问题来看待，只是记录而不是促进业已发生的社会变革，而且在至少是一个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战争，它们当然是相当恰当的。

一个例子就是最早的社会学作家之一的爱德华兹（Lyford P. Edwards, 1970），他主要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中概括出革命的一般性原因。对于他而言，革命的社会意义大于政治意义，而这也导致他减少身体暴力和权力转换的要素。“在法国，推翻君主制和封建制并非是由法国大革命导致的，”他认为，“大革命只是把法国的实际权力转移到中产阶级的手中这一事实变得清楚了。”（Edwards, 1970, p. 16）

参考法国是有意义的，因为对于爱德华兹来说，革命的过

革命与反革命

程始于那个完全法国的现象，即知识分子的效忠的变化。知识分子把他们的一片忠心从对旧秩序的服膺中退出，转向了一个新社会的蓝图。政府的统治也转移到了激进分子的手中，因为他们热诚献身而且团结统一。在权力中他们满怀其信念所带来的信心，残暴地使用他们的权力，带来了惊人的成功——为了创造新秩序，他们的受害人的死都是次要的。但这一阶段涉及到对人性这么大的压力，反过来它的反动使人又回归到正常状态下，而且这一回归，往往还是在从前的统治者的统治之下，这是革命作为一类事件的特征。

佩蒂（Pettee, 1938）将“社会不均衡”这个术语作为革命的一种解释介绍过来。他使用帕森斯社会学的术语，将社会视为基本上稳定的，而均衡性则体现在危机或者骚乱之后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状态上来。通常用池塘来与之类比，池塘缺水就导致鱼的数量下降，但如果水增加了鱼又会重新繁殖。利用这个概念其所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社会，和池塘不同的是它不断地变化着。如果均衡点也移动了，如何可能来判定何时社会变得不均衡以致根本的变革势必要发生？

约翰逊（Johnson, 1964, 1966）的观点更加系统，顾尔将他自己的进步的剥夺的观念与约翰逊的观点联系起来。和顾尔形成对比的是，约翰逊并不寻求决定心理的动机，而是坚定地集中探讨有关的社会过程。而且，他把自己的论证逻辑比他的社会学前辈们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识到要理解大革命就必须将之置于更广的背景下，而且这一背景还必须涵盖其他更小的行动形式的可能性。“革命的现象必须首先被放到产生革命的

社会系统中去并与之联系起来，而起它还必须根据对社会变革和政治发展的了解来考虑。”这就导致约翰逊（1964，p. 2）采用纽曼（Sigmund Neumann, 1949, pp. 333 - 344）对革命的定义：“在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经济上的财产控制以及社会秩序的主导神话方面的一场彻底的根本性的变革，由是也就表示发展的连续性上的一次突变。”与阿伦特（Hanah Arendt, 1963）不同，她强调革命并非只是变革，而约翰逊则正确地提醒我们这就是它们的本质而且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事实。革命是社会变革，是某种形势下严峻的系统性的社会不均衡的结果。由于不均衡所导致的社会功能紊乱是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原因，当它面临另一个原因即精英不妥协的时候，革命就发生了。“需要两个因素才能产生革命，二者之一就是精英的现状”（Johnson, 1964, p. 6）。充分条件是任何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起到“官能障碍的加速器”的作用，这也就是说许多“促使或者使已经存在的革命层面的功能紊乱无法缓和的事件”之一（Johnson, 1964, p. 12）。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说社会革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约翰逊和科利一样，赋予武装力量的作用极大的意义。革命，对于他来说，就意味着武装起义；如果没有起义就发生了变革，那么有变革但并非革命。他给的例子是日本的德川幕府的下台，尽管公平的话只能说这其中事实上有着暗含的武力的要素，许多学者也确实将明治维新当作一场革命来讨论。然而毫无疑问在完全被训练有素而且忠诚不二的武装力量支持的政府那里，起义反对它是不会成功的。既然军官也构成精英的一

革命与反革命

部分，而且其他等级与他们生活的社会有效的隔离开来，这就意味着武装力量在革命的形势下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性。

这就导致约翰逊提出了一个六种类型的革命：扎克雷农民起义、千禧年叛乱、无政府主义的造反、雅各宾式的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阴谋政变以及军事大起义。区分这些种类涉及到应用四个标准：活动的目标、革命者的本性、革命的目的以及革命是被安排的还是自发产生的。

扎克雷农民起义是农民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只带着补偿其所受委屈的有限的目标。千禧年叛乱，不管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都是对世界全新的激进变革的期望上升。无政府主义的造反是对现代化的反动，他们反对政府权威，带着怀旧式的想法力求回到旧的秩序中去。这三种都涉及到群众性的运动以及很大的自发性。在另三种类型里，精英领导群众从而安排好行动。激进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大’革命”（Johnson, 1964, p. 45），而且他给出法国大革命作为这个小种类中的最经典的例子。但是事实上，一个所谓的大革命的一个例子就归到第五类阴谋政变（为什么是阴谋？不是所有的政变都是阴谋吗？）里去了，还有一个到第六类的军事大起义里去了——它也被行家看作“游击战”。

这样分类的缺陷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划分这六类而没有选择其他，其原因并不清楚。事实上，前三类里的很多例子（扎克雷农民起义、千禧年叛乱、无政府主义的造反）根本就很难被当作革命，因为他们要么没能打倒政府要么没能改变社会体系。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约翰逊辩称为了某些目的，叛乱和革

命的区分并不重要；尽管提到革命的策略，所有的区别就在于成功还是失败。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声明中最简介的说明了革命要求获胜，他说：“我们必须凝聚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无疑我们就都会一个个地被绞死。”然而，约翰逊（1964）就其引导人们首先研究大革命意味着他们还需更小一些的革命这一点而言，还是应该得到称许的。

在他的《革命的变革》一书中，约翰逊（1966）修正了他的立场，重新强调均衡性的重要性，将均衡性的故障视作社会价值的结构无法与政治社会环境的变革相协调的结果。他认为，随着变革的发生，“权力收缩”的形势出现，在这个情况下统治精英们诉诸于增加其势力以保住其地位，如果他们没能适应社会变化的局面，革命的基本前提就具备了。约翰逊接着寻找不均衡性的指标，这些指标可以被用作一个社会里革命倾向的指数的基础。他提出自杀、犯罪以及军事参与的比例作为可能性，而晚近的关于什么是现今被称做“政治冒险”的作品则表示其他的。和从前一样，最终仓促的革命只是某种“催化剂”，但催化剂，按其本性它们相当难于预料，也难于系统化。

所有的这些解释其问题都在于它们无法很好的解释为什么革命发生了，而且他们对于为什么它们没能发生就解释得更糟糕。历史充满了各种国家和社会的例子，按照这些标准这些国家和社会都本应该是短暂的，但事实上它们却还是设法活下来了。对于19世纪而言奥匈帝国是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这个时候是炸弹正等着引爆的时期。但搭上了一次世界大战才真正的引爆了它。另一方面，由其开创的明显

革命与反革命

更加一贯的、符合逻辑地组织起来的国家则提供了证据表明逻辑可以有多缺乏作为政治稳定的工具的传统了。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各自都以不同的方式象征了“后二战”（post-1945）的世界里社会工程没能协调好按理说乐意的人民和他们的统治精英的好意的计划的情况。

以上所讨论的顾尔（1970）的政治暴力的模型，包括了对群众疏离于统治者以及诉诸武力的方式的实质性的考虑。甘姆逊（William L. Gamson, 1975）以类似的方式，试着确定在革命的形势里的关键阶段支持或者反对政府的各个标准。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的生活中事实上都有民意测验，而且不再仅仅只在先进的民主社会里，显然会有未来会有分析革命的数据，而对过去的历史事件我们还只能进行推测。

政治的解释

第二章中对革命的分析是一个政治学家眼中看到的革命，但却陷入了各色的革命的政治冲突理论之中，论述这些冲突理论的最著名的学者是密西根大学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

由于革命之所以（区别于骚乱、起义和造反）而被称为是革命，是因为革命中有政治权力的转移，政治冲突论者将冲突视为是革命的基本的起因。蒂利（Tilly, 1978, p. 193）将革命的“正弦定理”定义为：“革命的结局是一群权力拥有者被另一群权力拥有者取代。”而我则将其定义为一组革命事件，

而更欣赏我自己在《对革命的一项研究》（Calvert, 1970b, p. 5）中所作的定义：“政府在某一特定时刻被武力或可信地威胁使用武力而改变。”但实际上我们讨论的是同一个事情。

相比于革命事件本身，蒂利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于革命前社会群体的疏远和重组这一过程，因此他的分析“顽强的反对迪尔凯姆主义，坚决地支持马克思主义，但有时也纵容于韦伯，有时依赖于密尔。”（Tilly, 1978, p. 48）不采用“过程”和“事件”之类术语，而区分“革命状态”和“革命结果”，并视革命结果为涌现出诸多君主（而这正是其所定义的革命状态）的产物。他因此而正确地认识到革命的一个基本特性——革命是争夺的产物：结局是没有变化、一场政变、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还是一场大革命，取决于环境和被竞争者动员起来的权力的总量。任何只从政府和只从反政府者的角度出发的来解释革命的观点，都无法解释清楚到底在发生什么。

蒂利（Tilly, 1978, p. 200）认为有三个导致诸侯争霸局面的原因：第一个是出现了竞争者或竞争者联盟，并提出要“排他性地攫取权力”的替代要求；第二个原因是某个社会群体坚定地认同这一要求；第三则是政府军队没有镇压竞争者或其支持者的意愿或者能力。对于蒂利而言，第一个阶段中最重要的是观念在促进正当化可选择性要求中的作用，并因此突出知识分子的作用（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和摩尔）。而对第二个原因，蒂利的观点则和顾尔（Ted Gurr, 1970）、戴维斯（James C. Davies, 1962）以及斯梅尔瑟（Meil Smelser, 1962）多有一致，都认为可通过个人态度分析而推断革命的倾向。而对于第三个

革命与反革命

原因，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和其反对者直接的权力平衡。因此，在赞同军队的关键性作用以及战争的后续效果的同时，蒂利更倾向于强调是因为军队无效的后果，而不是削弱军队效率的阴谋。

因此，蒂利（Tilly, 1978, pp. 211 – 12）认为，革命的结果，除了革命状态之外，还取决于其他两个因素：“挑战者和政权内部人士的革命联盟”，以及革命的竞争者及其盟友控制充足的军队。那么，到底多少部队才是“充足”的呢？正如蒂利更早的时候所说，顾尔（Ted Gurr, 1970, pp. 235 – 6）提出的“内战的发生几率随着持不同政见者的比例相对于政权的强制性的控制达到了相等而上升”。它没有对这一断言作出评论，但作为一个关于内战（比如革命的形势）的声明，它极可能是不对的，因为内战与对外战争一样，由于一方或者另一方的过分自信而很可能发生，就像 1980 年海湾战争的例子。无疑，对于一场革命的出现而言必要的是有足够的力量以摧毁政府。但没有不考虑失败的可能性的革命会设法应付足够的力量。因此这个数量不能作为实际被部署的武装力量的多少指南。

蒂利认为实际用来获取革命成果的力量取决于革命是被看作一套“紧张—放松”的机制还是一个“竞争”的模型。每一种都有其支持者，尽管事实上可能二者都是对的：一场革命的结局是竞争的产物，因此在这场行动本身之前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暴力，但是，这场行动本身对于斗争者而言就是冒险，因此如果有时间的话他们很可能力求控制压倒性多数的军事能力。只有当政府先发制人了他们才会借着不充足的资源而相信

运气，以此继续。不管发生了什么，在革命的形势里的胜利属于在关键时刻获得了最起码的必要的武力的一方，凭借这些武力它就能制服反对者。然而，在这个有限的意义上（比如这一事件）的结果并没有耗尽政权中的武装力量的能量。蒂利（和顾尔以及其他一起）正确地认识到，武力的使用越强则越可能结构的变迁更深远，并且假设（虽然它并没有把这个论点带得很远）在巩固的第一个短暂的阶段发生的变化越剧烈则越可能这些变革越广泛越持久——他提出，这些就是“大革命”。然而，与其他许多作者一样，他倾向于支持这个广为传播的错误的假定，这个假定认为反过来也能成立，就如他在“军事政变基本上没有产生过重大的结构变迁……因为它们只涉及在极其有限的几组竞争者中较小的重组”（Tilly, 1978, p. 220, 加了着重号）的评论中所显示的，而不管事实——事实也正如他继续解释的那样，在那样一个竞争者获取了权力而且与之前没有代表的社会团体结盟的地方（土耳其，日本），影响深远的变化才可能出现。

因此蒂利使暴力的政治适应利益表达以及结成联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被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好地交叉研究了，同时他认识到使用暴力所带来的不同。如果要批评它的话，那就是它强调群体暴力的事件，蒂利将它看作一个“残忍的伤害”（Tilly, 1978, p. 176），过于强调暴力的来源而恐怕没有足够深入地阐明领导阶层将暴力的倾向转成带有政治成果的有效的集体行动的方式。他所了解的集体暴力的研究就是那些来自美国和西欧的研究。这里边的迹象都表明大批遇害和受伤的人都

革命与反革命

是支持政府的军队所制造的，而且骚乱往往由警察暴力开始也由它而终结，这是惯例而不是例外（我们可以补充，最近拉丁美洲的迹象证实了这一点）。“在集体暴力中主要的变化就来源于政治组织的操作”（Tilly, 1978, p. 182）。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了，即集体暴力主要是一种政治现象，而至于革命它就是集体暴力的产物，取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经济或者社会条件而是政治原因。

哲学的解释

现代哲学对革命的解释还是由汉娜·阿伦特有挑战性的而且常常有挑衅性的作品主导着。阿伦特的《论革命》（1963）起源于1959年春天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关于“美国与革命精神”的讨论会，《论革命》首先就涉及战争和革命的相互关系；因为对于她而言战争和革命是20世纪的首要特征，而且，如她所称，如果二者经受住了意识形态的正当理由，那么它们将给未来标记上一个主要的问题。

对于阿伦特来说，革命是最近的政治现象之一。但革命的隐喻则让我们回到最古老的政治传统，让人不安的事实是根据这些最古老的传说，政治有其罪恶中的起源。革命是要寻求自由，革命者是那些在暴政面前为自由而战的人。但对于阿伦特来说，在欧洲法国大革命没能实现其支持者的目标，湮没于恐怖之中，反过来又屈从于专政，而美国革命得以实现了发动这场革命的男人和女人们的目标，而且在西半球建立了献身于

“追求幸福”的跨时代的新秩序”(1963, p. 135)。这对于阿伦特来说是一件有着超越性意义的大事:“不仅是美国革命,而且还有它之前和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是大西洋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事件’”。

我们今天仍然处于历史发展的符咒之下,因此我们会发现很难理解一方面是革命另一方面是宪法和创建,它们就像相互关联的连词。

(Arendt, 1963, p. 122)

那么,谁是真正的革命者呢?对于阿伦特来说,用革命寻求自由,他们就是那些创建自由而且建立一个人们可以在其中获得自由的社会。但是,正如她所观察到的,仅仅在美国获取了自由的信念,它的古怪的后果之一就是美国与欧洲的革命传统区分开来。“要义在于当即使是美洲大陆的革命家们的发言和行动就好像他们熟记了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教科书那样,但他们也没有听说过美国革命那样一个东西”(Arendt, 1963, p.218)。正如阿伦特警告她的同胞的,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自己没能记得革命产生了美国,共和国的成立并非由于历史的需要也并非由于有机的发展,而是由于一个深思熟虑的法案:自由的基础”(Arendt, 1963, p.219),由于这个疏忽,结果只能使别人确认法国革命使他们寻找的惟一正确的典范。

现在法国读者可能很合理地就辩称今天的法国第五共和国完全同美国一样保障其公民的自由。那不正是美国象征的精髓

革命与反革命

自由雕像，在法国铸造了又越过大洋赠给了姐妹共和国吗？美国革命就没有它自己的暗伤吗？当在 1787 年宪法的名义下弗吉尼亚和南卡罗莱那州的人们想要将他们的黑弟兄们排斥在自由的祝福之外时，美国革命打了个呵欠，一场内战随之而来，这场内战也是 20 世纪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野蛮的事件之一。那些看到了美国政府和平庸的拉丁美洲独裁者之间新奇的密切关系的拉丁美洲人（例如）会难道不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吗——不管它有多不对——即谈到美国革命也不过只是一个新的阴险的帝国主义的外表而已？在富裕与自由之间事实上存在关系吗？而且，如果真的存在，这种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至少在这一点上阿伦特既有备而来又坦坦荡荡：

当别人告诉我们通过自由我们才理解自由的企业，我们很少会做点什么来驱散这个荒谬的谎言，而且时常我们装作仿佛我们也相信财富和丰裕在战后东西方的“革命的国家”中危如累卵。我们声称财富和经济上的福利是自由的产物，而我们本应该首先明白这种“快乐”革命之前就已经在这个国家就已经是保佑（blessing）了，而且它的原因在于在温和的政府下自然的富足，既不是政治自由也不是资本主义释放出来的“私人动机”，而政治自由和资本主义在缺少自然财富的情况下只会将每个地方都导向不快乐而且集体贫困。

（Arendt, 1963, p. 219）

而且，她还预言到：“经济增长有一天可能会被证明是祸根而不是好事，而且它也决不会导致自由或者构造一个防护它自己的存在的东西”（Arendt, 1963, pp. 219 - 20）。

于是，自由有着特殊的性质，它本身是好事，是人类社会取得的最高成就。革命的问题在于它的精神没能找到合适的自我表达的机制。因此这本书以作者认为是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的实际后果来结尾：不是政党政治，她把政党政治当作人民选举精英进行统治，而是“初级共和国”的代表自我统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当然正是铭记在构成俄国双重权力的基础的“苏维埃”或者委员会的体制上的真正的理念，而且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十月革命以后使苏维埃和委员会服从党的意愿。毫无疑问要不是俄国人民缺少自由社会里的德性的体验，这就不会发生了，或者至少不会发生得这么快了。自由的代价就是永远的警觉，美国历史的教训就是在更大的自由的引导下或者在失去自由的时候需要有进行改革和制度重组的持续的要求。几乎所有的现代民主社会都是革命的产物：瑞士、荷兰、英国、瑞典、美国、法国。但所有这些社会都必须抵挡对他们的自由的挑战，他们之所以能继续维持民主的惟一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革命只是部分地取得成功，因此革命的安排其效果有待完全腐蚀。因此阿伦特写道，在美国水门事件和反伊朗政府丑闻提醒我们，我们多么不能信任我们选出来实现我们意愿的这些人。说谎成了“封面故事”，打破法律赦免被称做“维持看似合理的否决权”，强盗和暴徒被招呼成“自由战士”，

革命与反革命

杀戮平民被称做“打击经济目标”。*

民主政治的领袖当然就处在困难的位置上了。领导并不只是跟着别人不成熟的意见走，而是要向他们说明如何才能通过可接受的方式取得他们想要的好处。人们可能会对其所追求的目标和使用的手段有着清晰的认识，但所挑选的方式事实上未必总会导向他们选定的目标。民主政治下领导的本质就是认清根本目标，而且建立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有利于人们以能够与这个社会的精神相容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不幸的是，民主政治的领导们常常不止于此。他们为可怕的权力欲和群众们的奉承所驱使，变得越来越不负责，随意将所有的反对污蔑为骚乱，最终，他们糟糕地歪曲了自由，用反对的事实来证明他们自己观念的正确性。近年来统治者和精英们一次又一次地用他们的手指、隐喻的发言向世界揭示，在自由的小柜子里，他们经常试着——而且尝试得实在太成功了——通过控制他们借以做出决定的信息来盗取其信徒的良好意愿。

事实上启蒙运动的遗产有着双重性。阿伦特集中探讨自由的实现。但自由是通过理性实践来实现的，而且也只能通过理性的实践才能实现。为了二者之一牺牲任何一个就是否认了作为区分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人类进步的教训的潜在性。理性告诉我们自由不能通过崇拜非理性获得。因此如果想要创立政府以保障自由，政府必须是理性的政府，而且必须限定它们的权力。自从1945年以来，既信任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又

* 此处有删节。——编者

相信需要从文化中清除理性的，关于它所造成的最终后果中最让人寒心的例子就是零年（Year Zero）的柬埔寨杀戮的战场，当时独立的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农民革命家故意打碎先进文明的痕迹，减少城镇人口，任何一个人只要你看起来像个知识分子你就会被杀掉，他们相信他们是在反抗权威——尽管反抗谁的权威他们从来没有弄明白过。

思想的作用

然而，要引导我们重新评价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阿伦特恰当地把重点放在了革命的中心悖论上：革命既是暴力的，缺乏政治的理性，也是重建，体现了理性的社会组织。无论重建的过程其目标有多遥远有多模糊，还是极其难见在政治中使用暴力却在人类社会的最终的进步中没有表现出一小步的前进的。即使是许多成功地在 1945 年以来阻止了世界前进的政变的始作俑者，也有其目标，在其中我们能确定它有某些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很可能对于他们而言，在那样一个社会里政变发起者中的主角就是一个英明的统治者，他的命令可以得到农民们无条件的服从，这些整洁、健康、努力工作的农民自知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在私人的田地里欣然工作很长时间以使所有人都富裕起来而且领袖的太太可以在巴黎做头发。但是，不管有多虚假有多不合适，在执行的命令和法令方面，思想存在着而且有着现实的政治后果，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加上枪杆子的威胁。那么如果思想如此强有力，为什么我们人民不

革命与反革命

能重申我们想要别人倾听我们的思想呢？

在革命的构想中思想居于中心，首先是因为所有的政治生活都是按照思想来构筑的，第二是因为革命这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就是贴在许多事件或者一系列活动之上的标签，这些事件和活动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味，第三是因为变革的确切涵义、人们用以测定是否一场革命已经发生的准绳，本身就是由文化决定的。

承认思想的力量，当然是在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赞美革命有些人害怕革命的各种原因中最重要的。在心理上，极其烦扰的事就是要发现在一个社会里被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发生的深远的变化，而个人则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员。弗洛姆（Erich Fromm, 1960）就认为被阿伦特作为她所为之鼓与呼的首要政治德性的自由，是某种让许多生而自由的公民们感到害怕的东西，而且如果出现了合适的独裁者承诺接过他们肩负责任的重负，这些公民们就准备去除掉自由。在“认知上的不一致”的心理学的涵义上，我们发现那些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创造了深远的变革的人们，很快就会被别人发现他们指出事物的新秩序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了。

然而，如果革命是一场精神的建构，它也就不太容易为人所接受。思想常常跨越国界自由传播，讨论革命的作家们已经很长时间认识到这个外国的旅行者在传播新的社会观念中起到的作用。因此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革命很容易就被看作是成功的宣传的结果或者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的某种社会传染病了。这话里有点意思，但如果革命是一种社会传染病的

话，最好的救治（以医学类比之）就是免疫而非手术了，因为正是在社会内部而不是来自国外产生了革命基本的前提条件，而且如果那些前提条件不存在，它们当然就不能被任意地引介，而只能在比如一场军事战败之后，通过势不可挡地使用武力来介绍。

如果一个政府真的稳定的话它就不可能被推翻。然而，只要什么构成政治稳定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构成真正的稳定性的东西就是有争议的。文献中主要的分歧在于那些把稳定看作某种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东西以及那些把稳定看作连续性的统一体之间。但是在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的各种权威之间也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总共产生了六大学派的思想。结果在政治稳定的原因和后果的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混乱。后边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深入探究政体被取代的方式以及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也因此澄清“什么构成了政治冒险”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由于正如上文所记录的，最大的讽刺在于无视围绕着最基本的概念上的不确定性，有实践经验的政客们不愿参与会导致“扰乱”不友好的政体的措施。例如通过“去稳定化”，才能理解白宫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团队为了恶化智利的金融危机以及阴谋用武装力量驱逐阿连得总统所采取的措施。去掉其特有的委婉的说法不说，我们就被置于革命的传染病在实际中不断有效地实践的情况下。据报道类似的手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政府也使用过，它用这些手段来反对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的政府，在后者的情况中它导致政体内部的分裂为美国的干预提供

革命与反革命

了机会。*

在不同的社会之间移植革命（或者反革命）思想的可能性当然既是在职的政府所害怕和憎恨的，也是那些想要改造世界将它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的人们赞美和仿效的。如果它是变革的隐喻，它就是最后的一个，它的功效和难于抗拒的后果，对于所有类似的政权而言都很重要。然而，如果它是一个隐喻的话，可以传播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如果它不是，也还有几个好理由能让我们相信革命理论的蔓延是大打折扣的。

首先，从历史现象中很清楚地表明发生革命的主要原因都是产生革命的各个社会所特有的。事实上，关于主要的实例让人吃惊的是，它们被提前长时间期待（既有希望也有害怕）的程度，但它从人们对它的所有预期中分开。最初的爆发是伴随着特殊事件的发生而发生的，这些特殊的事件都是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所特有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自身通过类比已知的事件来反应得比他们在其他情况下更迅速或者更有效。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因为技术进步的本质，它保证了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力量平衡不断变动。

其次，导致革命爆发的主要因素是政府的行动；是政府促成了革命。拒绝向和平的示威者开枪的政府，避免凌辱了神圣的象征物的政府，不向他们政治上的对手进行报复的政府，不让自己开始由于贪婪而轻蔑的政府，不与武装力量对抗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能经得住风暴天气，这样的风暴推翻了从前和

* 此处有删节。——编者

以后的许多其他政府。

因此，第三，即使从国外传来的信息很诱人，这并不表示它在新社会里的效果也会同样好。在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在荷兰、德国以及意大利的许多团体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仿效了法国发生的事件。然而直到法国军队来了，这些事件中的大多数都没多大意义。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照样被模仿，但布达佩斯、Reval以及伤害的起义都被镇压了，而且直到俄国军队在1915年西进，外蒙古才在俄国以外的其他地区经历了俄国式的革命。思想，不管是关于革命还是关于别的什么，必须在一个社会框架内阐释，而如果社会的框架不同于产生这个思想的社会，那么他们的结果也必定会不一样。

然而，现在害怕新思想是政治中常有的事了，因为政客们获取的很多的来自于使他们的追随者们支持，使得他们相信他们至少懂得世界事实上是如何运转的。在这个方式上的任何变化都会招来麻烦，一个主要的变动可能会导致政客们无力控制局面。因此，例如戈尔巴乔夫总统和苏联主动采取措施结束欧洲自1947年以来的分隔状态时，而且，不管有多慎重美国政府还是原则上接受了这些初步的举措，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还是不合适地说到共产主义的危险、在欧洲有保留短射程的核武器的需要，以及受到社会主义的布鲁塞尔对国家主权的威胁的不太可能的可能性。但然后她自己就以她的方式来实现革命性的变革，而且她也不会是第一个自充的革命家结果却发现社会结构强烈地抵制来自上层的变革，事实上，来自上层的革命的这个词的确切涵义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参考书目

Adelman, Jonathan R. (1985). *Revolution, Armies, and War: A Political History*. Boulbor, Dolo., Lynne Rienner.

Adorno, T. W., Frenkel Brunswik, Else, Levinson, Daniel J. and Sanford. R. Nevitt (1964).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John Wiley.

Allison, Graham T. (1971).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riole, Stephen J. and Hopper, Gerald W. (1984).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London, Frances Pinter.

Arendt, Hannah (1963). *On Revolu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Birnbaum, Pierre (1988). *Stat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rkenau, Franz (1937).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the Paris Commune,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Sociology Review*, 29, January, pp. 1 – 11. Brier, Alan (1982). "Rev-

olution as a form of political succession”, unpublished paper for Planning Session on Political Succession, ECPR Joint Sessions of Workshops, Freiburg.

Brier, Alan and Calvert, Peter (1975). “Revolution in the 1960”, *Political Studies*, 32, No. 1, March, pp. 1 – 11.

Brinton, Crane (1952).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Butterfield, L. H. (1959). “July 4 in 1826”, *American Heritage*, 6, no. 4, p. 14.

Calvert, Peter (1967).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Political Studies*, 15, No. 1, February, pp. 1 – 11.

Calvert, Peter (1969).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change”, *Political Studies*, 17, no. 4, pp. 446 – 57.

Calvert, Peter (1970a). *Revolution*. London, Pall Mall and Macmillan.

Calvert, Peter (1970b). *A Study of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alvert, Peter (1982). *The Concept of Class: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Hutchinson.

Calvert, Peter (1984). *Revo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Frances Pinter.

Chorley, Katharine C. (1943). *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Cohan, A. S. (1975). *Theories of R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革命与反革命

London, Thomas Nelson & Sons.

Davies, James Chowming (1962).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No. 1, February, p. 5.

Davies, James Chowming (ed.) (1971). *When Men Revolt and Why: A Reader in Political Violenc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Debray, Regis (1965). "Latin America: the Long March", *New Left Review*, 33, September – October, p. 17.

Djilas, Milovan (1957).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London, Thames & Hudson.

Dunn, John (1972). *Modern Revolu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a Political Phenomen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nn, John (1985). "Understanding revolutions" in John Dunn, *Rethinking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Essays 1979 – 8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nn, John (1989). *Modern Revolu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a Political Phenomenon*.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ckstein, Harry, ed. (1964). *Internal War Problems and Approach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Eckstein, Harry (1965). "On the etiology of internal wars", *History and Theory*, 4, pp. 133 – 4.

Edwards, Lyford P. (1970).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isenstadt, S. N. (1978). *Revolu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Ellwood, Charles A. (1905). "A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revol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 pp. 49 – 59.

Elster, Jon (1983). *Sour Grapes: Studies in the Subversion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ner, S. E. (1976).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2nd revised, ed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France, Anatole (1930). *Penguin Island*. Crown 8vo Edition, London. The Bodley Head.

Fromm, Erich (1960). *The Fear of Freedo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allie, W. B. (1955 – 6). "Essentially – contested concept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56, pp. 167 – 98.

Gamson, William A. (1975).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Homewood, Ill., The Dorsey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89). *Sociology*. Oxford, Polity Press.

Golstone, J. (1982) "Th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revolu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8.

Goodspeed, D. J. (1962). *The Conspirators: A Study of the Coup d'Etat*. London. Macmillan.

Guevara, Eneesto Che (1967). *Guerrilla Warfare*. New York

革命与反革命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Gurr, Ted Robert (1970).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ll, John A. (1985). *Powers and Liberties The Cause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 Harmondsworth, Penguin.

Hardin. Russell (1982).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Jackson. Geoffrey (1973). *People's Prison*. London, Faber & Faber.

Janis, Irving L. (1972). *Victims of Groupthink*.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Johnson, Chalmers (1964).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 Stanford, Cal..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Johnson, Chalmers (1966). *Revolutionary Change*. Boston, Little Brown.

Kuhn, Thomas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umar, Krishnan (1971). *Revolu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European idea*.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Laurie, Peter (1970). *Beneath the City Streets: A Private Enquiry into the Nuclear Preoccupations of Government*. London, Allen Lane.

Le Bon, Gustave (1960).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intro. Robert K. Mert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Leiden. Carl and Schmitt, Karl M. (1968).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Lenin, Vladimir Il'yich (1968). *Stat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cIntyre, Alasdair (1973). "Ideology, Social Science and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5, no. 3. April, pp. 321 – 42.

MacIntyre, Alasdair (1983). "Is a scienc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possible", in A. MacIntyre, ed.. *Against the Self images of the Age: Essays on Ideology and Philosophy*, 2nd edn. London, Duckworth.

Mann, Michael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Everett Dean (1920). *The Behaviour of Crowds: A Psychological Study*. New York and London, Putnam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ederick (1962). *Se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azlish, Bruce, Kaledin, Arthur D. and Ralston, David B., eds (1971). *Revolution. A Reader*. New York. Macmillan.

Migdal, Joel S (1974). *Peasants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革命与反革命

Moore Barrington, Jr (1972).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Moore Barrington. Jr (1972). *Reflections on the Causes of Human Misery*. London, Allan Lane.

Mouzelis, Nicos P. (1986). *Reflections in the Semi – Periphery: Early Parliamentarism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Balkans and Latin America*, Basingtoke, Macmillan.

Neumann, Sigmund (1949).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War”, *World Politics*, 1, no. 3, April, pp. 333 – 50.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kane, Rosemary H. T. (1987). *The Likelihood of Coups*. Aldershot, Gower.

O’Sullivan, Noel, ed. (1983).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olitical Reality*. Brighton. Wheatsheaf.

Palmer, Robert R. (1959).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ettee, George Sawyer (1938).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oper, Karl Raimund (1962).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4th edn (revise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oper, Karl Raimund (1957).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orter, Roy and Teich, M, eds (1986). *Revolution i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ulantzas, Nios (1975), *The Crisis of the Dictatorships : Portugal, Greece, Spain*, trs. David Fernbach. London, New Left Books.

Rejaj, Mostafa (1977),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evolutionary Strategy*. New York, David McKay.

Robertson, David (1985). "Rationalizing revolutionary ideology", *Econometrika*, 53. January, pp. 84 – 108.

Sartori, G. (1970).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4.

Shafer, D. Michale (1988). *Deadly Paradigms : The Failure of U. S. Counterinsurgency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kocpol, Thea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ocpol, Theda (1982). "What makes peasants revolutionary?" *Comparative Politics*, 14, April, pp. 351 – 75.

Skocpol, Theda (1988), Social Revolutions and Mass Military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40, no, 2, January, pp. 147 – 168.

Smelser, Neil J. (1962).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u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Smith, Dennis (1983). *Barrington Moore : Violence, Mora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Macmillan.

革命与反革命

Sorokin, Pitrim Aleksandovitch (1925). *The Sociology of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Spengler, Oswald (1923).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Munich, Beck, 2 vols.

Taylor, Michael (1976). *Anarchy and Cooperation*. London, Wiley.

Taylor, Michael (1982). *Community Anarchy and Lib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Michael, ed. (1988). *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rborn, Goran (1980). *What Does the Ruling Class Do When It Rules?* London, Verso.

Tilly, Charles (1975a). "Revolution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III*. Reading, Mass., Addison – Wesley, pp. 483 – 555.

Tilly, Charles, ed. (1975b).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 – Wesley.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66). *The Ancient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tro Hugh Brogan, trs, Stuart Gilbert. London, Collins/Fontana.

Touraine, Alain (1977). *The Self – production of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ouraine, Alain (1981). *The Voice and the Eye: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ynbee, Arnold J. (1946). *A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rimberger, Ellen Kay (1972). "A theory of elite revolution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7, no. 3. Fall, pp. 191 – 207.

Trimberger, Ellen Kay (1978). *Revolution from Above: military Bureaucrats and Development in Japan, Turkey, Egypt and Peru*.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Trotter, William Finlayson (1953). *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a). *The Modern World –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The Academic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b).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6, no. 4, September, pp. 387 – 415.

Wilkinson, David (1975).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the Elements of Victory and Defeat*. Palo Alto, Cal. Page – Ficklin Publications.

Winch, Peter (1958).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革命与反革命

Wolf, Eric (1970). *Peasant Wa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Wolfenstein, E. Victor (1967). *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 Lenin, Trotsky, Gandhi*,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Zaagorin, Perez (1982). *Rebels and Rulers, 1500 – 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vols.

Zeitlin, Maurice (1988). *The Civil Wars in Chile (or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s that Never We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译者后记

写作是一件很耗人的事，你必须为找到一个好的论题而殚精竭虑。而翻译或许因为少了这份创造性而容易一些，但是如何理会作者的本意并做到信、雅、达，却也是一份不轻松的活。当然这并不能作为我们推卸责任的托词。本书翻译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不达意之处，还请读者方家不吝赐教。（Email 地址是 changdz@tom.com）

中国人对革命并不陌生，因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离开我们并没有多久。更不论 18 世纪中叶以来，我们一直面临着这个“五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在本书中，作者是把革命作为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形式来加以论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还处于一场革命之中。邓小平也曾说过，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正合了本书的意思。相信本书作者对这个社会科学中重要话题的深刻阐释会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多有助益。

本书第一、第二章由张长东翻译，第三章则由陈玲和冯明亮二人合译完成，最后由张长东统一校稿。

译者

2004 年冬于燕园